

大貓熊來臺「團圓」史——1988 至 2008 年的大貓熊輸入申請案

龍 緣 之*

摘 要

1988 年至 2008 年間，臺灣公、私立動物園五度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出大貓熊輸入申請案。本文首先對「貓熊外交」、大貓熊短期租借和海外「科研合作」進行歷史性回顧，在此基礎上，對申請案進行歷史脈絡之重建。其次，本文對 2005 年大陸政府宣佈贈臺大貓熊以來，引起國內外關注及社會爭議的兩度申請案進行歷史事件的分析。對於臺灣而言，輸入大貓熊是在政治、保育、法治及民主程序等面向中極具爭議的問題。2008 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當選後，兩頭被命名為「團團」、「圓圓」（名字意味著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友好及親情）的大貓熊才在爭議之中抵臺。大貓熊來臺的歷史，亦反映了政黨輪替前後的「保育」論述之變化，以及具有政治、文化、保育象徵等多種意涵的貓熊在社會中角色。

關鍵詞：大貓熊、臺灣、臺北市立動物園、保育、貓熊外交

* 2013 年取得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電影學碩士學位，2018 年取得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行動亞洲 ACTAsia 傳播與項目研究專員

The Coming of the Giant Pandas “Tuan Tuan” and “Yuan Yuan” to Taiwa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Examined 1988-2008

Lung, Yuan-chih*

Abstract

From 1988 to 2008, a total of five applications for the importation of giant pandas were submitted by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zoos in Taiwan to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article first offer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henomena of panda diplomacy, panda rentals,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in relation to panda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regards them as the appropriate contexts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applications. The article next enters into a close analysis of the last two applications made since 2005, which attracted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arrival of a pair of giant pandas in Taiwan. The importing of giant pandas from Mainland China generated controversies at several levels: political, conservational, legislative, and procedural. Yet, despite the controversies, afte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a Ying-jeou won the election in 2008, a pair of giant pandas named “Tuan Tuan” and “Yuan Yuan”, which together represent the Chinese word for “reunion”, arrived in Taiwan. This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regarding the admission of giant pandas into Taiwan first of all illustrates the changing discourses on “conserv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regime change in Taiwan in 2008. It also demonstrates how, as a vital political, cultural and conservational symbol, the meanings and roles of the giant panda have shifted greatly over time in Taiwanese society.

Keywords: Giant Panda, Taiwan, Taipei Zoo, conservation, panda diplomacy

* School of Arts, Peking University, Master Degree in Art, 2013.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singhua University, Doctorate Degree in Philosophy, 2018. Communications & Research Officer, ACTAsia

壹、前言

中國大陸政府自 1982 年起，不再將大貓熊（Giant panda, 學名 *Ailuropoda melanoleuca*）作為贈品，轉而透過租借大貓熊取得保育基金。¹ 然而，對其的圈養及「域外保育」(ex-situ conservation) 即便以海外「科研合作」為名，卻仍存在爭議。在國際公約、國內法規，以及保育手段、動物權益等多重制約及考量面向中，大貓熊的跨境移動成為國際關注的問題。² 在此背景下，「大貓熊來臺」更受到兩岸關係的影響。實際上，自 1988 年起，以臺北市立動物園為主要申請者，五度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提出大貓熊輸入申請案。在前三度申請案皆受到否決後，2005 年，連戰以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主席身份訪問中國大陸，此為 1949 年以來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首度會面，大陸贈送臺灣兩頭名為「團團」、「圓圓」的大貓熊。彼時臺灣由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執政，第四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再次受到否決。直至 2008 年政黨輪替後，在動物個體、保育議題、國際公約、國家法律規定、政府的主管機關人事等皆相同的情況下，審查小組核准由臺北市立動物園提出的申請案，兩頭大貓熊於同年年底抵臺。

十九世紀末起，因應西方的大貓熊熱潮，大貓熊在數十年間除了被西方人士捕獵，亦被用於外交活動。在近代史中，牠們逐漸成為當代中國的「國寶」，民眾被鼓勵參與一系列「保護／保育」活動。³ 大貓熊的重要性不僅在其象徵價值，同時也是人們基於好奇心、意圖目睹或擁有其動物個體，以致於當代社會更賦予其在自然、生態和物種保育方面的號召力，成為全球範圍內備受關注的「旗艦物種」(flagship

¹ 中國大陸將「貓熊」稱作「熊貓」，臺灣則兩者皆有使用，但以「貓熊」為多，兩者所指為同一物種。本文保留原徵引著作名稱，其餘行文處則以「大貓熊」、「貓熊」指稱該物種。

² 基於保育生物學 (conservation biology)，物種保育應以「域內保育」(in-situ conservation) 為主，「域外保育」為輔。「域內保育」是在保育對象之原自然棲息地內的保育工作，「域外保育」則是將生物移置到人為圈養環境中進行保育，後者應僅為「域內保育」遇到困難時的特殊和緊急手段。然而，在許多案例中，「域外保育」被不當使用，成為圈養繁殖和利用野生動植物的托詞。「域內保育」在中國大陸又稱為「就地保護」、「棲息地保護」；「域外保育」在臺灣又稱為「移地保育」，在中國大陸又稱為「遷地保護」、「異地保護」、「易地保護」等。

³ 英文之“conservation”一詞，臺灣譯作「保育」，中國大陸譯為「保護」。然而，「保育」和「保護」實有不同之意涵。若將“conservation”譯作「保護」則易與英文“protection”之意混淆。由於本文針對 1980 年代起的大貓熊歷史進行研究，中國大陸、臺灣及國際社會當時已逐漸接受「保育」觀念，「大貓熊來臺」亦被作為「保育」活動之「域外保育」實踐。因此，本文多採用臺灣譯之「保育」一詞。

species)。⁴

百餘年以來，作為一種在世界範圍內具有辨識度的物種，大貓熊不僅引起科學家的興趣，其符號的多重性也被不同領域的學者所關注。歷史和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從科學史、環境史、人與動物關係研究（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Studies, 縮寫為 HARS）等學科視角，探討動物與社會的互動、動物再現，以及包括生態環境在內的保育和動物保護等跨學科問題。歷史學者宋雅蘭（E. E. Songster）的科學史博士學位論文〈國家主義的自然空間：王朗自然保護區和大貓熊作為國家象徵的出現〉（“A Natural Place for Nationalism: The Wanglang Nature Reserv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Giant Panda as a National Icon”）以及著作《貓熊國家：中國現代符號的建構和保育》（*Panda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a's Modern Icon*），具體分析了保育觀念和自然保護區的建立，與大貓熊作為「國寶」的文化和政治價值的共構關係，兼具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科學史和環境史視角。⁵

米勒（Ian Jared Miller）所著之《野獸的本質：東京恩賜動物園的帝國與展覽》（*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以〈大貓熊在人類世〉一章對該物種在東京上野動物園展出的始末，進行了細緻的歷史研究。米勒指出日本的生態之現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以及帝國主義背景下的現代動物園歷史，乃是國際政治在時空推移下的結果，將大貓熊的科學史、社會史和當代歷史研究進行融合。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關於大貓熊的歷史文獻中，相較於其他歷史時期，研究者對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關注似乎較少。這樣的現象所呈現的問題是，對大貓熊如何從十九世紀末被獵殺、被捕捉以在西方國家展示，繼而成為全球性的保育象徵之歷程，較難以提出具說服力的說明。日本學者家永真幸的《貓熊外交》（《パンダ外交》）

⁴ 「旗艦物種」是保育生物學中的一個概念，並不是指在生物學意義上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物種，而是指能吸引公眾關注的物種。「旗艦物種」由於具有一定的公眾號召力，被認為可以促進社會對物種保育的關注，中文又稱為「旗艦種」。

⁵ E. E. Songster, “A Natural Place for Nationalism: The Wanglang Nature Reserv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Giant Panda as a National Ic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E. E. Songster, *Panda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a's Modern 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⁶ I. J.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pp193-229.

一書，關注國民黨政府將大貓熊作為外交禮品的歷史，以呈現大貓熊與人類互動的時間脈絡中，不同政體與該物種的關係，以及態度變化的承繼邏輯。意即，從「捕獵」到「保護／保育」的行為差異，並非以政權的更迭為區別。本文在上述之研究基礎上，從「國家」到「國際社會」、兩岸關係，對「大貓熊來臺」所負載的歷史意涵得以有更清晰的掌握。⁷

迄今為止，已有不在少數的研究者梳理了大貓熊在近代史中的角色變化，如具有代表性的大貓熊科學家胡錦矗主編之《熊貓的風采》（1990）、《大熊貓歷史文化》（2008），方敏的報導文學《熊貓史詩》（2008），以及亨利·尼可斯（Henry Nicholls）的專著《來自中國的禮物——大貓熊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 2011）等。⁸ 1980年代以來，保育觀念在世界各國逐漸被接受，無論是自然保護區的設置，或是以海外「科研合作」為名義的租借，絕大多數圍繞大貓熊的種種活動皆由此主導。人們對保育觀念和工作的認識，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大貓熊和當代社會的互動方式。

本文以大貓熊來臺的歷史事件中的申請書、政府和法院文獻，以及新聞報導為史料基礎，除了關切「大貓熊來臺」在兩岸關係和國際社會等兩種政治維度中的意義，亦分析動物生命在人們對「保育」的詮釋中扮演的角色和意義。其目的在於，一方面透過大貓熊豐富的象徵性，突顯動物生命鑲嵌於當代社會的方式；另一方面，試圖探究政治、經濟、保育、法治等多種因素，如何在大貓熊來臺歷史中被彰顯或遮蔽。

⁷ 家永真幸，《パンダ外交》（東京：株式会社メディアファクトリー，2011）。

⁸ 胡錦矗，1929年生於四川開江縣，1955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學院（西南大學前身之一）生物系，195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生物系脊椎動物研究班。胡錦矗是西華師範大學珍稀動植物研究所教授、原所長，是世界著名的中國大陸第一批大貓熊專家，被譽為「中國大熊貓研究第一人」、「中國大熊貓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熊貓教父」、「熊貓教授」、研究「國寶」的「國寶」。

貳、從貓熊外交到短期租借

1869 年以降，來自西方國家的捕獵、國共兩黨先後主導的抓捕，以及隨後或贈送或租借他國的大貓熊展出，是其成為明星動物並且「瀕危」的主因之一。⁹

一、外交禮品

迄今為止，已有諸多文獻梳理西方人獵捕大貓熊之歷史，但關於中方所主導的活動卻較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官方的大貓熊捕捉，於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展開，並延續至 1949 年之後。最初，中華民國政府察覺西方世界對大貓熊的興趣，以此強化與特定國家的關係。¹⁰ 1941 年，由於中國和西方盟國共同對抗德國及日本，美國成立了「美國援華聯合會」(United China Relief) 以籌集救濟中國的資金。對此，國民黨政府捕捉了一對大貓熊作為回禮，由宋美齡代表贈予美國，這便是近代首次進入國際政治舞臺並深受歡迎的「潘弟」和「潘達」。¹¹ 二戰結束後的 1946 年，中方又一次將捕捉而來的一頭大貓熊送往英國，並命名為「聯合」，以象徵中英之間的友好關係。¹²

⁹ IUCN (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在物種瀕危等級裡，定義了八個等級，分別是 (1) 滅絕：如果一個生物分類單元的最後一個個體已經死亡，列為滅絕。(2) 野生滅絕：如果一個生物分類單元的個體僅生活在人工栽培和人工圈養狀態下，列為野生滅絕。(3) 極危：野外狀態下，一個生物分類單元滅絕概率很高時，列為極危。(4) 瀕危：一個生物分類單元，雖未達到極危，但在可預見的不久將來，其野生狀態下滅絕的概率高，列為瀕危。(5) 易危：一個生物分類單元雖未達到極危或瀕危的標準，但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其在野生狀態下滅絕的概率較高，列為易危。(6) 低危：一個生物分類單元，經評估不符合列為極危、瀕危或易危任一等級的標準，列為低危。(7) 數據不足：對於一個生物分類單元，若無足夠的資料對其滅絕風險進行直接或間接的評估時，可列為數據不足。(8) 未評估：未應用有關 IUCN 瀕危物種標準評估的分類單元列為未評估。其中，極危 (CR)、瀕危 (EN) 和易危 (VU) 三種並稱為「受威脅物種」。紅色名錄自 1963 年誕生開始，就有兩個目標：評估物種的生存狀況，以及反應物種保育的迫切性，協助公眾和決策者開展保育行動。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June 16, 2020).

¹⁰ 亨利·尼可斯 (Henry Nicholls)，黃建強譯，《來自中國的禮物：大貓熊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 (新北：八旗文化，2011)，頁 69-70。

¹¹ 近年於南京公開的中國國民黨內部文書「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報告表」，揭示了此次贈送的相關安排。其中，國民黨特別重視針對美國的宣傳活動，如全美兒童的大貓熊命名大會、美聯社 (Associated Press，縮寫為 AP) 對大貓熊運送至美國的全程報導、在美華僑的大貓熊歡迎會，以及包括大貓熊影像和飼養過程等信息在內的媒體宣傳活動，足見大貓熊肩負的外交重任。〈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報告表 (1941 年)〉，《中央宣傳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南京) 藏，718(5)-13。轉引自家永真幸，《パンダ外交》，頁 57。

¹² 胡錦蟲主編，《大熊貓歷史文化》(香港：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8)，頁 63-67。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官方對大貓熊的合法捕捉，除了作為贈予外國的「國禮」，也作為人工圈養之用。1954 年，北京動物園在四川省寶興縣（古稱穆坪）設置動物搜集站，捕捉「年輕的」、「好看的」大貓熊以用作外交禮物。1950 至 1980 年代，僅寶興一地就「向國家輸送了一百一十五隻大熊貓」。¹³ 1977 年，中國科學院組織由科學家、獵人、部隊等一百多人組成的野人考察隊。當年的獵人表示，他們「圍上山，到處找，野獸隨便打，打了一年多，什麼動物都見了」。¹⁴ 由此可見，對大貓熊的需求，不僅出於普通民眾謀取暴利的心理，也可能是將動物視作自然資源的國家政策。

從西方物種收集者和民眾共同建構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 式象徵，到中共建政後對自身形象的選擇，大貓熊在當代受到人們喜愛的原因值得被分析。當代中國選擇大貓熊作為國家形象的原因，或許也在於歷史上沒有一個朝代將其作為國家象徵。實際上，雖有研究者梳理了中國古代典籍中的相關史料，試圖論證「貔貅」、「騶虞」和「獏」，皆為該物種的古稱，但仍存在一些程度不一的爭議。¹⁵ 大貓熊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應不具有足以與現代相當的社會價值和辨識度。

1955 年起，中國大陸以「國禮」形式，將大貓熊贈予他國。最初，中國大陸政府將兩隻大貓熊送給蘇聯；1965 年開始，又先後送出擔負了「鞏固邊防責任」的五頭大貓熊到平壤動物園。¹⁶ 1970 年代，中美關係隨著「乒乓外交」進入正常化階段，美國前總統尼克森 (Richard Milhous Nixon, 1913-1994) 於 1972 年 2 月訪華並獲贈一對大貓熊，此與國民黨贈予美國「潘弟」和「潘達」已相隔三十一年，大貓熊再次發揮了重要的外交功能。

然而，尼克森的訪華引起了日本政府被孤立的憂慮，促使了時任首相的田中角榮於 1972 年 9 月訪問中國大陸，並同樣受贈一對大貓熊。實際上，這一時期被稱

¹³ 方敏，《熊貓史詩》（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頁 216。胡錦蟲則指出，自 1950 年代起，寶興縣一共抓了一百三十六頭大貓熊，且主要抓的是幼體，因為幼體最容易捕捉，參見劉敏，〈拒絕「降級」的大熊貓〉，《三聯生活周刊》，第 11 期（2017），頁 106。另可參見《北京動物園志》對寶興動物搜集之統計，自 1954 年至 1976 年間，該搜集站運回北京動物園的大貓熊數，約為五十餘頭。楊小燕主編，《北京動物園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頁 174-175。

¹⁴ 方敏，《熊貓史詩》，頁 276。

¹⁵ 胡錦蟲主編，《大熊貓歷史文化》，頁 1-10。

¹⁶ 胡錦蟲主編，《大熊貓歷史文化》，頁 77。

作中國的「貓熊外交」階段，英法等國的領導人訪問中國大陸時，都帶著能獲贈一對大貓熊的願望。¹⁷ 大貓熊所具有的象徵體系，顯然在國際政治舞臺及民眾之間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中國大陸政府也在 1955 至 1980 年間，贈送了二十四頭大貓熊給九個國家。¹⁸ 回顧這一段歷史，中國大陸政府成功地強化了國家和大貓熊形象之間的聯結。

二、短期租借

為了保護有限的大貓熊資源，中國大陸政府決定於 1982 年開始不再將其作為禮品。取而代之的，是由國務院批准的大貓熊出國巡展（短期租借）。¹⁹ 多個國際保育組織指出，這類活動可能威脅大貓熊物種的生存。除了作為國家符號，大貓熊亦是國際社會日漸重視的「保育」觀念之象徵。1961 年，世界知名的保育團體「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 以下簡稱 WWF）成立之初，即選擇以大貓熊作為其代表符號。²⁰ 1980 年代，中外第一次在自然保護領域的科研合作，亦以野外大貓熊及其自然棲息地的考察為主題。²¹

基於保育生物學 (conservational biology)，短期租借的活動可能違反《瀕危野生動植物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中文又稱為「華盛頓公約」，以下簡稱 CITES) 中，非出於科學研究與改善動物境遇，不得進口瀕危動植物的規定。²² 於此，WWF、IUCN 和美國動物園及水族館協會 (American Zoo and Aquarium Association) 於 1988 年先後發表聲明，呼籲禁止所有租借大貓熊的活動。²³

¹⁷ I. J. Miller,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pp. 203-205.

¹⁸ 胡錦蟲主編，《大熊貓歷史文化》，頁 86。

¹⁹ 胡錦蟲主編，《大熊貓歷史文化》，頁 87。

²⁰ 在 1986 年以前，「世界自然基金會」的舊稱為「世界野生動植物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英文縮寫皆為 WWF。美國和加拿大仍保留其舊稱。

²¹ 作為該項目的主要成果，可參見胡錦蟲、喬治·夏勒 (George B. Schaller) 等人所著之學術著作《臥龍的大熊貓》(*Wolong's Giant Panda*) (1985)。喬治·夏勒是世界知名的美國動物學家、博物學家和作家，致力於野生動物的保護和研究，在非洲、亞洲、南美洲都曾開展動物學研究，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世界上三位最傑出的野生動物研究學者之一。他是 1949 年以後第一位接受 WWF 委託，以在中國大陸開展中外野生動物研究合作項目的西方科學家，就本次研究所寫的《最後的貓熊》(*The Last Panda*) 一書不僅是野外研究的科學家手記，還有作者對 1980 年代大貓熊保育及研究的狀況、觀念和問題的思考。

²² 自 1973 年起，CITES 於美國首府華盛頓開放簽署，因此中文又稱「華盛頓公約」。

²³ WWF 於 1988 年 1 月表示，出租大貓熊會減少圈養環境中有繁殖能力的個體繁衍的機會，使得這些個體對完整的養殖計劃無法起到應有作用。WWF 曾向中國大陸政府有關機構提議，把出租的大貓熊限於

在美國本土，短期租借大貓熊的做法亦可能違背《瀕危物種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於是，美國魚類及野生動植物管理局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以下使用縮寫 USFWS) 在 1993 年採取法律行動，宣布停發野生大貓熊進口美國的許可令，並開始研擬新的人工飼養準則，對後來的大貓熊長期海外租借的形式產生重要影響。1993 年後，美國聖地亞哥動物學會開始與 USFWS 合作制定大貓熊租借政策，前者開始和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以下簡稱「研究中心」）臥龍基地建立合作關係，討論長期租借之可能性。在最終制定的長期租借契約裡，聖地亞哥動物園的科學家將可以推動自己的研究計劃。門票等財務收入，亦足以支付租金給「官辦非政府組織」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英文名稱為 China Wildlife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CWCA）。最後，雙方敲定每對大貓熊以一年一百萬美金的金額進行租借。這種方式受到 USFWS 的贊同並發出進口許可令，並在 1998 年起以此租借關係為典範，此即為延用至今的中國大陸政府與各國動物園建立長期海外「科研合作」的大貓熊租借模式。²⁴

必須指出的是，以「保育」為名的「科研合作」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貓熊租借」的政治和經濟考量。「域外保育」經常被簡化為「圈養繁殖」，以迎合普羅民眾想要親近動物的心理。²⁵ 胡錦矗指出，圈養繁殖大貓熊的好處，是使得人們不必從野外再捕捉。²⁶ 因此，「贈送」、「短期租借」和「長期租借」大貓熊，在保育的正當性方面，皆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同樣地，在長達二十年的大貓熊來臺歷程中，「何謂保育」、「如何保育」，也成為申請案的主要爭議之一。

年老、過於年幼或無生殖能力的。然而，對於大貓熊超過何種年齡即喪失生殖能力，無從規定；另一方面，讓生殖力尚在發育中的年幼個體，承擔出國風險，也不合理。轉引自喬治·夏勒，《最後的貓熊》（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4 年），頁 440-441。

²⁴ USFWS, "Policy on Giant Panda Permits," *Federal Register*, Vol. 63, No. 166, 1998, pp. 45839-45854. 尼可斯在其著作中詳述了這段歷史，參見亨利·尼可斯，《來自中國的禮物：大貓熊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頁 232-233。

²⁵ 「此前成都在實行大熊貓繁育獎勵方面的政策是：每出生一隻大熊貓，就獎勵高達五萬元的所謂『貓頭費』（幣別為人民幣）。」大貓熊應「優生優育」的觀念，於 2009 年被首次提出。如今，則已不再將「繁育數量」作為唯一的考核、獎勵指標。參見孫琪、袁藝睿，〈優生優育：大熊貓種群的新追求〉，《四川日報》，2011 年 8 月 16 日，第 5 版。另一方面，野外大貓熊育幼時期多至幼崽一歲半之時，圈養大貓熊卻大多在幼崽半歲以內，就被強迫提前斷奶，這將可能導致幼崽的發病率上升，且缺乏足夠的向母親學習行為的時間，亦可能影響牠們性成熟後的繁殖行為。

²⁶ 劉敏，〈拒絕「降級」的大熊貓〉，頁 106。

參、臺灣「貓熊」標本和「黑白熊」事件

擁有、馴養和展示動物，在中、西方皆有漫長的歷史。把動物當成珍奇收藏品，或用籠、欄，或者人工仿建的自然生態環境來統治和研究動物，是人類與非人類動物互動的方式、是人類對非人類動物的宰制手段，也構成了對動物的態度 (attitudes toward animals) 不斷變化之歷史。²⁷ 在大貓熊真正來臺之前，臺灣曾有兩次展示「假貓熊」的紀錄。其中，標本既是對自然作為「資源」之時，具有代表性的動物物種的展示，也是備受民眾關注的、與人們的情感或歷史記憶相關的動物個體之外觀展示。1980 年代，臺灣省立博物館（以下簡稱省博）二樓的動植物標本陳列室中，有一頭外形「逼真」的「貓熊」標本，為目前所知的在臺灣的「第一例」。²⁸ 這個「標本」由常為動物園及博物館製作標本的夏元瑜和省博員工林俊聰所製。彼時國際社會因為「竹子開花」現象引發貓熊熱潮，促使夏元瑜產生製作「貓熊」標本的想法，邀林俊聰共同製作。兩人以進口的安哥拉羊皮結合保利龍假體，再以木頭雕刻指爪而成。²⁹

1987 年 12 月，臺南一家於 9 月 26 日開幕的私人動物園宣稱擁有一頭「吃竹葉」、「毛色黑白相間」的「黑白熊」，引起媒體和專家的注意。曾製作過省博「貓熊」標本的夏元瑜應《聯合報》之邀，至該動物園實地觀察後，根據「毛色」、「毛髮長短」、「以前肢捧嫩竹進食」且「攝食時間長」等，初步鑑定園方展出的應該就是貓熊，但認為應再就其牙齒和糞便進行確認。³⁰ 園主洪滄海則一方面強調這隻熊

²⁷ 埃里克·巴拉泰 (Éric Baratay)、伊麗莎白·阿杜安·菲吉耶 (Élisabeth Hardouin-Fugier) 著，喬江濤譯，《動物園的歷史》(Zoos: histoire des jardins zoologiques en Occident (XVIe-XXe siècle))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頁 V-VI。

²⁸ 筆者查詢臺灣報刊檢索系統之「貓熊標本」相關內容，未找到此前之案例，進而詢問近年來研究臺灣動物標本歷史的學者鄭麗榕。鄭麗榕亦表示，據目前所知，省博的「貓熊」標本應為臺灣的第一例。

²⁹ 據報載，該貓熊標本是用一種阿拉斯加野獸的皮毛代替，用鐵架支撐作成結構體，加上保利龍「雕刻」而成。林茂，程宣武（圖），〈臺灣貓熊？〉，《聯合報》，1985 年 5 月 17 日，第 12 版／綜藝·萬象。筆者於 2020 年 7 月 29 日訪問林俊聰並檢視此「貓熊」標本，得知報載內容並不準確。夏元瑜 (1909-1995)，北平師範大學生物系畢業，曾在北平動物園工作，1949 年前後來臺，成為臺灣中學標本模型教具重要提供者，並為臺北、新竹動物園及多所博物館製作標本。1970 年代後以雜文聞名，自稱「老蓋仙」。林俊聰，標本製作與爬蟲類研究專家、臺灣重要的標本採集者，曾任國立臺灣博物館動物組組長等，現任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管理組副研究員。

³⁰ 〈黑白熊之謎有了初步答案 老蓋仙觀察異獸說是貓熊 再鑑定牙齒糞便，便可完全確認〉，《聯合報》，1987 年 12 月 27 日，第 3 版。

不是貓熊，而是以十多年時間將馬來熊和臺灣黑熊雜交繁殖而得，另一方面，卻又誤導民眾認為其正是貓熊。哺乳動物專家林良恭則帶了一批貓熊外文書籍至該園，但與園方交涉後仍僅能在十公尺的鐵欄外觀，進而得出其並非貓熊的結論，其餘各大學學者則持保留意見。實際上，園方「不願讓任何人接觸到辛苦所得的寵物」，也不接受專家對「黑白熊」進行鑑定。³¹ 染色專家和部分民眾指出該園是將馬來熊染色為「貓熊」樣貌，過程僅需兩小時就可完成。臺南地檢署亦派人收集資料。³² 夏勒則經照片判定「黑白熊」絕非貓熊，該事件最終被認定是動物園的一次宣傳活動。³³

臺灣的兩度「假貓熊」展出事件，在不同的程度及層面上，反映了社會對大貓熊的好奇心和欲望。一般而論，被製成標本的動物需要一定的珍稀性，或是因其與社會記憶的聯結而有其價值。³⁴ 但是，在上述之「貓熊標本」的展出中，不少遊客或與其合影或駐足觀賞，卻很少有人知道其材料是偽造的。省博動物組透露，作為替代的野生動物之珍貴程度大不如貓熊，但若為了標本的展出而犧牲一頭貓熊的生命，既做不到也不值得鼓勵。在此態度下，似乎只要標本外形相似，就能達到自然教育功能。³⁵ 而在「黑白熊」事件得以引起媒體、專家、政府等多方的關注，反映臺灣社會對大貓熊的欲望之外，也突顯出動物展演的商業本質。財政部也表示，若展示的動物為「真的」大貓熊，則是被列為管制進口的「匪偽物品」。若價值在十萬元以上，依「懲治走私條例」規定，業者還將觸犯刑罰。³⁶ 園主或許正是因此含糊其辭。許家維亦透過藝術作品《黑與白：熊貓》指出，該事件的荒謬性應該被放在臺灣社會 1987 年解嚴後的歷史時空，以及兩岸關係和國際政治的脈絡下被看待。臺灣社會似乎希望透過同中國大陸一樣，擁有萬眾矚目的大貓熊，以緩解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的焦慮。³⁷ 臺灣「貓熊」標本和「黑白熊」事件，是國際性的大貓熊

³¹ 〈生人莫近，牠只是寵物!? 隔柵觀望黑白熊 各路專家黑白猜 妄身不明 反教育·熱門話題 像極了〉，《聯合報》，1987 年 12 月 28 日，第 3 版。

³² 〈黑白熊 染色體？爭論焦點 假如牠是真的 有人指控 宣傳招攬生意〉，《聯合報》，1987 年 12 月 31 日，第 3 版。

³³ 〈黑白貓熊·真假莫辨 保育大師一語道破 謝勒博士說 是個冒牌貨〉，《聯合報》，1988 年 4 月 17 日，第 10 版／社會新聞。

³⁴ 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頁 303。

³⁵ 林茂，程宣武（圖），〈臺灣貓熊？〉，1985 年 5 月 17 日，第 12 版／綜藝·萬象。

³⁶ 〈假如牠是真的 觸犯緝私條例〉，《聯合報》，1988 年 1 月 5 日，第 3 版／現代生活。

³⁷ 臺灣藝術家許家維長期研究東亞歷史，將其融入以不同媒介表達的藝術創作中。在其 2018 年系列作品《黑與白：熊貓》中，即以日本「漫才」的表演形式，重新演繹近代史中大貓熊和人類互動的重要事件。

熱潮在臺灣的表現形式，應被放在兩岸於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角力背景中看待。在一定程度上，「假貓熊」也預示了臺灣社會對「貓熊展示」之於「政治、經濟或保育」意義的思辨。

肆、第一至第三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1988-1991）

1988 年起，臺灣民間團體和洪文棟等政治人物，致力於促成貓熊來臺，共計三次向主管部門提出申請，皆遭到否決。³⁸ 若將發生於 1988 年至 1991 年之間的第一至第三次的申請案，與 2000 年以後的第四次、第五次的申請案進行對比，「貓熊來臺」的爭議中的政治、經濟考量，以及對保育議題的詮釋皆有頗大差異。針對前三次申請案的歷史重建，將能更完整的掌握貓熊來臺事件的歷史脈絡。

一、第一次申請案（1988）

1988 年 6 月，「中國動物園協會」在理事會上，通過了關於大貓熊、金絲猴等珍貴動物出境展出之規定。外國動物園要求借展大貓熊必須向「中國動物園協會」提出申請；借展大貓熊需經中央政府批准。外國動物園需經由展覽為「中國動物園

在作品第四章〈黑白熊〉中，以臺南動物園的「馬來熊染色事件」為基礎，創作了以下對話：

（人對馬來熊說）「從今以後，你要作為熊貓生活了。」

（馬來熊回答）「作為熊貓，到底是為了什麼？」

（人對馬來熊說）「為了臺灣！臺灣現在，在國際上被孤立了呢。你覺得為什麼呢？」

（馬來熊回答）「為什麼？到底為什麼？」

（人對馬來熊說）「因為臺灣沒有熊貓啊！」

（馬來熊回答）「到底是怎麼回事？」

（人對馬來熊說）「熊貓是有那樣的力量。所以你今後要作為那樣的熊貓生活。」

（中略）

（投影中的虛擬貓熊對馬來熊說）「從現在開始你要作為熊貓而活了。作為馬來熊的你已經消失了。是熊貓，你就是熊貓。」

在第五章〈團圓〉中，許家維亦讓代表「中華民國」的演員表示，臺灣已擁有「貓熊」（即上述臺南動物園事件中的「馬來熊—黑白熊」），而欲拒絕中國大陸贈送貓熊「團圓」和「圓圓」。許家維，影像作品〈黑與白-熊貓〉，「跨域讀寫：藝術中的圖書生態學」特展，於2018年7月21日至10月14日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展出。

³⁸ 洪文棟為 1983 年至 1989 年間任立法委員，於 1986 年起，任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理事長，開始積極透過國外友人向大陸爭取貓熊，並於立法院推動引進貓熊的許可。洪文棟為「貓熊來臺」投入二十年之久，因此被立法院長王金平稱作「貓熊立委」。參見林美瑛，〈大貓熊二十年來臺路歷程〉，《動物園雜誌》，第 117 期（2010），頁 5。

協會」保護大貓熊及其他珍稀動物籌募資金，並提供物資或技術資助。外國動物園在借展申請書中，也必須寫明展覽的目的、場址和醫療飼養的條件；大貓熊展覽禁止在商業中心舉行，且必須是非商業性質，不允許公司、商人從中牟利。為確保大貓熊在外國展覽時的健康和安全，中國大陸方面必須派出足夠的飼養員、技術員和獸醫。³⁹

在上述背景下，時任立法委員的洪文棟與中國大陸「林業部」⁴⁰、北京動物園等進行交涉，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於1988年11月5日開立的CITES出口證明書，以向臺灣主管部門申請貓熊輸入。⁴¹「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以下簡稱「動物園之友協會」）也透過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全臺約有85%的民眾希望引進大貓熊。⁴²彼時農委會擔心大貓熊引進涉及直接貿易，違反「三不」政策，且臺灣如果有大貓熊，中國大陸人員能不時來臺進行調查及瞭解飼養狀況，可能形成許多政治方面的困擾。⁴³農委會主任委員余玉賢指出，本次乃是中國大陸贈送大貓熊給予臺灣民間團體（CITES出口證明書載為「臺北動物園之友協會洪文棟理事長」⁴⁴），主管單位要從「是否符合國際公約」及「保育技術觀點」上考量。⁴⁵農委會副主委葛錦昭表示，在向國際保育團體尋求意見後，由於來臺大貓熊必須僅供繁殖，若將其用於展示觀賞將受到國際強烈指責，若是為了研究及復育，則會因為國內無論在飼養技術、飼養環境及食料供應上都有問題，根本上是「言之過早」。彼時臺灣的野生動物進口活動中，涉及非法走私的情況較為嚴重，

³⁹ 〈借展大貓熊金絲猴 中共訂定有關規定〉，《聯合報》，1988年6月6日，第9版／大陸新聞。

⁴⁰ 「林業部」為1998年成立的中國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林業局之前身。2018年3月，根據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組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不再保留國家林業局。〈王勇：組建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不再保留國家林業局〉，人民網，2018年3月13日（<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8npc/big5/n1/2018/0313/c418468-29865099.html>），最後檢索日期：2020.5.20。

⁴¹ 洪文棟、張和民、林美瑛，《團團圓圓我的寶貝貓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8），頁128。

⁴² 林美瑛，〈大貓熊二十年來臺路歷程〉，頁5。

⁴³ 「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為彼時的臺灣對大陸政策。卓亞雄，〈敏感動物 兩岸頭痛 政治顧慮 中共也有〉，《聯合報》，1988年12月3日，第4版／社會觀察·大家談；陳承中，〈納下貓熊小心木馬計！？中共若要派員探視 怎生拒絕 進口發現新的變數 機會已微〉，《聯合報》，1988年12月6日，第4版／社會觀察·大家談。

⁴⁴ 第一次申請案中的CITES出口證明書影本，可參見洪文棟、張和民、林美瑛，《團團圓圓我的寶貝貓熊》，頁135。此處之「臺北動物園之友協會」的全稱為「臺北市動物園之友協會」，此協會為新光集團自行成立、捐助的民間團體，在貓熊來臺的歷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⁴⁵ 陳承中，〈納下貓熊小心木馬計！？中共若要派員探視 怎生拒絕 進口發現新的變數 機會已微〉，1988年12月6日，第4版／社會觀察·大家談。

不僅影響國際形象，亦恐受到禁運。在此國際背景中，「大貓熊來臺」無異於「火上澆油」。第一次申請案因此於1988年12月8日遭農委會正式駁回。⁴⁶

二、第二次申請案（1989-1990）

1989年4月，臺北動物園以「動物園之友協會」名義，積極邀請日本東京上野動物園飼育課大貓熊組組長中里龍二來訪，評估飼養貓熊的環境並獲得肯定。園長陳寶忠表示，該園有能力照顧大貓熊，計畫派員赴日受訓。夏勒則建議臺灣可以「接受貓熊」，但將牠們留在大陸的繁殖站，如此一來或可顯示臺灣人民真正關心貓熊。⁴⁷此時，大陸奧會主席何振梁向中華青年體操代表隊團長詹德基提及送貓熊給中華奧會的意願，但中華奧會主席張豐緒在徵詢WWF專家意見後決定婉謝。⁴⁸雖然如此，立法院經濟、內政兩委員會仍舉行「貓熊來臺聽證會」，與會人員由傾向贊成貓熊來臺的經濟委員會邀請，討論最終偏向接受貓熊的共識。⁴⁹

此次，大陸方面由CWCA選定北京動物園貓熊「陵陵」與「樂樂」來臺，由臺北市立動物園著手通過其上級單位臺北市教育局，向農委會申請輸入，此為第二次申請案。⁵⁰此時，因為臺灣與大陸尚無直接貿易及贈送動物的規定，對於CITES之有關規定，「動物園之友協會」同意透過第三國（轉口國）政府核發「再輸出許可證」以讓貓熊順利來臺。但是，農委會函請日本協助受到拒絕，香港協助轉口意願可能也不高。⁵¹在本次申請案中，農委會將「大陸奧會」擬贈「中華奧會」貓熊，以及中國大陸「林業部」擬贈「動物園之友協會」之申請案併案審查。⁵²農委會邀

⁴⁶ 〈貓熊熱告一段落 現階段不准進口 農委會保育著眼 兼考量政治因素〉，《聯合報》，1988年12月9日，第4版／社會觀察·大家談。

⁴⁷ 周森惠，〈飼養貓熊又起爭議 木柵動物園 一口承擔沒問題 外籍學者說何妨留在大陸養〉，《聯合報》，1989年4月19日，第4版／社會觀察。

⁴⁸ 宮泰順，〈大陸又提贈貓熊 張豐緒予以婉謝〉，《聯合報》，1989年4月20日，第4版／社會觀察·大家談。張豐緒曾於政府單位擔任不同的要職，包括1972年獲任命為臺北市長；1976年擔任內政部部长；1978年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復出任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長及親民黨高級顧問，並且於1987年9月至1998年1月，任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

⁴⁹ 蔡振源，〈貓熊來不來 立院兩委會座談 贊成派略勝一籌〉，《聯合晚報》，1989年4月22日，第4版／話題新聞。

⁵⁰ 林美瑛，〈大貓熊二十年來臺路歷程〉，頁7；施美惠，〈動物園精心籌備 迎接大貓熊 擬妥養殖計畫 運送費思量 專人沿途侍候〉，《聯合報》，1989年10月24日，第13版／臺北要聞。

⁵¹ 蔡振源，〈貓熊來臺 勢必得轉口〉，《聯合晚報》，1989年9月18日，第4版／話題新聞。

⁵² 賈亦珍，〈貓熊／此間 養一頭貓熊，一年要花費三百萬美元！到底送幾對 也不清楚〉，《聯合報》，1990年2月27日，第5版／生活。

集專家學者與會審查貓熊飼養技術，但堅決反對貓熊進口的兩位保育界學者，認為不懂飼養技術無資格審查，退出審查會，最終其餘人士在「樂觀其成」、「外國能，大陸能，臺灣當然也能」的信心下，肯定了臺灣可以飼養貓熊。然而，由於國內根本沒有貓熊飼養專家，審查會中的動物、獸醫學者也只有三位，會議結論受到保育界質疑。另一方面，與會人士雖然認為飼養不是問題，但對繁殖貓熊則沒有信心。⁵³ 行政院長李煥聽取政務委員張豐緒及農委會主任委員余玉賢的報告後，特別指示要慎重行事、以國家形象為考量、注意國際組織的反應，並要求新聞局長對社會說明。⁵⁴

1990 年 6 月，以「平民」身分赴大陸的張豐緒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表示，將於該年 9 月北京（臺灣當時稱其為北平）亞洲運動會之前，推動臺灣准許中國共產黨員往訪，如此中國大陸將致贈作為「友誼象徵」的「許多頭貓熊」給臺灣。⁵⁵ 同年 8 月，行政院長郝柏村強調，在經濟發展後，生態保育必須受到重視，並援引世貿中心展出象牙製品、國人在南非捕殺海豹等情況，表示臺灣「不能成為國際上議論的對象」，指示農委會及相關單位，根據國際生態保育的觀念和作法，儘快決議並向外宣佈申請案結果。⁵⁶ 隨後，農委會否決了第二次的大貓熊輸入申請案。⁵⁷

三、第三次申請案（1991）

1991 年 3 月，第三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同樣由「動物園之友協會」提出，農委會表明「至少要有二隻公的及四隻母的貓熊，才有繁殖成功的可能」，此外也要在其他飼養環境、人力、財力都配合的情況下，才會同意貓熊來臺。一位未具名的農委會高級官員表示，「這表示大陸貓熊根本不可能踏上臺灣土地」。媒體報導援引官員說法，指出中國大陸為對政治人物達到籠絡示好的目的，已先後向動物園、

⁵³ 賈亦珍，〈飼養貓熊技術問題 臺灣應該可以克服〉，《聯合報》，1990 年 3 月 6 日，第 5 版／生活；王宛茹，〈學者保證能養活 近親交配是難題 飼養貓熊「無後」為大〉，《聯合晚報》，1990 年 3 月 6 日，第 4 版／話題新聞。

⁵⁴ 卓亞雄，〈引進貓熊不要影響國家形象 李揆指示應注意國際組織的反應〉，《聯合報》，1990 年 3 月 16 日，第 7 版／社會觀察。

⁵⁵ 合眾國際社北平廿三日電，〈釣魚臺賓館消息 臺北若准許共產黨員訪臺 張豐緒：中共將送很多頭貓熊給臺灣〉，《聯合報》，1990 年 6 月 24 日，第 3 版／焦點新聞。

⁵⁶ 寇維勇，〈依生態保育來考量 貓熊不會養就不要 郝院長指示儘快宣佈接不接受彼岸「禮物」〉，《聯合報》，1990 年 8 月 10 日，第 5 版／生活。

⁵⁷ 王宛茹，〈貓熊陵陵 樂樂不能來臺了！申請兩年未獲農委會同意 北市動物園放棄了〉，《聯合晚報》，1990 年 9 月 12 日，第 4 版／話題新聞。

奧會主席兼生態保育協會理事長張豐緒、觀光協會及省議員鄭逢時表示願意贈送貓熊。⁵⁸農委會以「臺北市立動物園尚未興建貓熊館」、「需四至六隻貓熊才適合做研究」及「須有第三國輸出入貓熊的特許證」等三項理由，再度否決申請案。⁵⁹

在申請案受到三度否決後，中國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於 1993 年 11 月 4 日致函海基會，希望海基會促成一對非繁殖適齡的貓熊於同年 12 月赴臺巡迴展出，展出的地點擬選在臺北動物園、雲林縣劍湖山遊樂區，各展出三個月。海基會副秘書長石齊平希望促成此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副主委高孔廉則認為需謹慎評估貓熊飼養的技術問題。⁶⁰《聯合報》資深記者卓亞雄赴四川臥龍自然保護區走訪後，以長文表示「第一次和老共的保育事務交手，只覺得老共在政治之下，沒什麼保育好談的，什麼原則都可以調整，甚至可以違背」。卓亞雄在自然保護區內和四川省政協、四川日報、成都市政協及四川大學等代表會面，對方甚至在遊說中連拍胸脯表示「沒關係，我們派人去幫你們養，養死了換一隻給你……」，突顯大陸方面的期待。⁶¹

由此得知，自 1988 年以來，關於貓熊來臺的討論即聚焦於政治及保育問題。⁶²接連三次的申請案皆被否決後，臺北市立動物園即便角色尷尬，仍進行了多次的境外參訪、觀摩和研習貓熊飼養，為接受貓熊繼續進行準備。⁶³然而，在 2005 年第

⁵⁸ 王宛茹，〈爭取貓熊來臺 北市立動物園又碰釘子 限送一對 怎麼繁殖 農委會擺明：沒有希望〉，《聯合晚報》，1991 年 3 月 12 日，第 9 版／生活。

⁵⁹ 范植明，〈貓熊館未建 不准進口貓熊 農委會提三個否決理由，動物園難以心服〉，《聯合報》，1991 年 3 月 30 日，第 13 版／臺北要聞。

⁶⁰ 大陸新聞中心，〈大陸貓熊訪臺 下月能否成行 海基會：專業技術無困難 好事一樁 陸委會：保育團體有意見 宜先評估〉，《聯合報》，1993 年 11 月 5 日，第 5 版／生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應中華民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成立的社團法人，屬受權處理海峽兩岸之間事務的機構。其業務上級機關為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中共中央臺灣事務辦公室。

⁶¹ 文·攝影／卓亞雄，〈搞貓熊他真行？〉，《聯合報》，1993 年 11 月 8 日，第 36 版／繽紛。

⁶² 《人民日報海外版》亦曾介紹 1988、1991、1993 及 2002 年等多次大陸欲贈臺貓熊，以及臺灣各界向政府申請貓熊來臺的多次嘗試。然而，由於兩岸信息不一致，本文以臺灣的文獻資料為主要依據。大陸方面的相關報導，可參見聶傳清，〈熊貓赴臺路崎嶇（特別報導）〉，《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 年 6 月 8 日，第 3 版。

⁶³ 2000 年 5 月 3 日，時任動物園副園長的陳寶忠投書《聯合報》，以〈大貓熊 是三通先鋒？是保育大使？如果引進「動機」無法獲國內外保育界認同，可能遭到前幾年培利修正案的貿易制裁〉一文表示，「反觀國內，大貓熊的引進始終脫離不了政治意味，身為政府機構的臺北動物園也常身不由己。民國七十八年臺北動物園在眾多的民意壓力下，提出引進大貓熊的申請」。參見陳寶忠，〈大貓熊 是三通先鋒？是保育大使？如果引進「動機」無法獲國內外保育界認同，可能遭到前幾年培利修正案的貿易制裁〉，《聯合報》，2000 年 5 月 23 日，第 15 版／民意論壇。筆者基於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引進飼養管理計畫〉，將其自 1990 年代起，為申請大貓熊來臺進行的準備工作「臺北市立動物園貓熊參訪、觀摩、研習」內容整理如下：1991 年，動物園員工赴美國華盛頓動物園、日本上野動物園，觀摩研習大貓熊

四度的大貓熊輸入申請案正式提出之前，臺北市立動物園園長陳寶忠在訪問 NGO 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其英文名稱為 Environment & Animal Society of Taiwan, 以下簡稱 EAST）時面交的文章寫道，「說真的，身為一個市立的動物園，層級不高，很多事不是我們能全盤做主的」；「所以我們的回答一向是：對大貓熊的引進，我們會做準備，但不會積極去爭取……（下略）」。⁶⁴該文指出，「特展館」（即 2008 年啟用的大貓熊場館）是由「新光集團透過動物園之友協會捐款興建的，並不是公務預算。大家也都知道協會十餘年來一直想引進貓熊，因此特展館一樓的主要展示場就是以貓熊為對象而設計……（下略）」。⁶⁴在綜述國際社會和中國大陸合作的貓熊保育活動後，強調其是 CITES〈附錄一〉之物種，「除供科學研究或有助於該物種的繁殖與生存外，都不得進出口」。文末強調貓熊來臺必須「當保育的大使」，為野外的棲地保育和臺灣的野生動物保育作貢獻，「否則那是我們沉重的負擔」。⁶⁴由此可知，大貓熊輸入申請案乃是政府和民間財團的合力促進，動物園作為官方飼養展演動物的單位，僅能配合上級意志、為貓熊的展出提供場地，並且在「保育」觀念中尋找合宜的解釋空間。

伍、第四次申請案及其爭議（2005-2006）

一、第四次申請案之背景

館硬體設施和飼養管理。2000 年前後，動物園員工和專家直接赴大陸研習的情況更為頻繁，包括「動物園之友協會」邀請多位大學教授和動物園員工赴北京、上海、西安、大連等動物園參訪（1996 年、2000 年）等。動物園也利用赴美參會時，至聖地牙哥（2000 年）、華盛頓動物園參訪（2001 年）；「動物園之友協會」邀請規劃設計單位及動物園員工至香港海洋公園大貓熊館（2001 年）、邀請員工至泰國清邁動物園（2004 年）參訪；2002 年，以陳寶忠為首的動物園員工參訪北京動、植物園，「動物園之友協會」亦邀請獸醫師參訪北京動物園進行技術經驗交流、研習大貓熊疾病醫療和管理事項等。參見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引進飼養管理計畫〉，2005 年 9 月 30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4QiAdYvc7xHfQquMlpPIhRaPPkZRN0z/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⁶⁴ 2005 年 6 月 16 日，陳寶忠園長訪問 EAST 時，面交紙版文章〈園長的話又見大貓熊〉。「園長的話」亦為臺北市立動物園刊物《動物園雜誌》之固定欄目，然而筆者查找 2005 年前後共二十期（五年）的《動物園雜誌》，陳寶忠雖於 100 期（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出版）、101 期（民國九十五年一月出版）、102 期（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出版）皆將「大貓熊來臺」作為「園長的話」欄目之討論主題，但重點皆在動物園於「保育」和「保育教育」工作上的角色，與本處之引文有頗大出入。

自 2004 年起，「動物園之友協會」再次向中國大陸政府爭取貓熊來臺，與北京動物園積極洽談，希望以借展方式促使貓熊來臺。然而，大陸方面認為貓熊出借涉及政治因素，且當時臺灣政經情勢不穩，因此未能有所進展。⁶⁵ 此時，為飼養貓熊而花費 3.2 億新臺幣打造的動物園「新光特展館」已在興建，預計於隔年完工。⁶⁶ 2004 年 5 月底，四川「臥龍基地」專家來臺交流。動物園園方表示，「三通應是熊貓能否來臺關鍵，兩岸關係一改變，熊貓可能說來就來」。⁶⁷

2005 年，在野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赴大陸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中國大陸在連戰於 4 月 28 日前往北京當天宣布贈臺貓熊。消息一出，包括陝西秦嶺、福州大貓熊中心、北京動物園和成都大貓熊繁育基地等飼養單位，皆表示願意提供貓熊。⁶⁸ 連戰則在參觀臥龍「研究中心」時表示，「大陸向臺灣贈送大貓熊，這是一個善意，是友誼和真誠，是一個大家沒法形容的感情」，他會竭力促成貓熊來臺。⁶⁹ 2005 年 8 月 27 日，CWCA 在「研究中心」舉行「向臺灣同胞贈送大熊貓座談會」，兩岸專家首次就貓熊來臺事宜進行正式會商。臺灣民間團體和研究等機構的十七位專家，以及十位大陸科研院所、大貓熊繁殖研究機構的專家，以及數十名有關部門和協會的代表出席。⁷⁰ 此後，大貓熊的第四次輸入申請案，由臺北市立動物園及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以下簡稱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分別提出。

第四次的輸入申請案之背景，較前三次有幾個需要被重視的差異。首先，贈臺貓熊行為乃是「連胡會」的重要象徵，使得本次申請案格外受到政治界、媒體界及保育界關注。其次，除了臺北市立動物園再次提出申請，位於新竹的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也加入角逐。⁷¹ 國民黨執政之臺中市政府，以及臺南市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等

⁶⁵ 陳子鈺，〈大貓熊 明年來臺有譜 北市立動物園積極與北京動物園洽談 來臺新居興建中〉，《聯合晚報》，2004 年 4 月 1 日，第 7 版／萬象。

⁶⁶ 林美瑤，〈大貓熊二十年來臺路歷程〉，頁 7；曾令儀，〈大陸貓熊來臺？動物園：沒進展〉，《聯合報》，2004 年 4 月 2 日，第 B5 版／大臺北。

⁶⁷ 「三通」是指兩岸直接「通郵」、「通商」、「通航」的簡稱，是中國大陸提出的兩岸交流提議；曾令儀，〈四川熊貓專家 28 日來臺交流 動物園「虛位」待熊貓 園方表示 三通是熊貓來臺關鍵〉，《聯合報》，2004 年 5 月 4 日，第 B1 版／北市焦點。

⁶⁸ 洪文棟、張和民、林美瑤，〈團圓團圓我的寶貝貓熊〉，頁 62-63。

⁶⁹ 馮昌勇，〈連戰表示竭力促成大陸贈臺大熊貓抵臺〉，《人民日報》，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 10 版。

⁷⁰ 聶傳清，〈兩岸專家會商贈臺熊貓事宜〉，《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 年 8 月 29 日，第 3 版。

⁷¹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之大貓熊輸入申請案，乃由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共同提出。參見財團法人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兩岸大熊貓和野生動物保育學術研究交流企劃書〉，2005 年 10 月 15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

多個地方政府或動物園，或加入競爭，或表態有意爭取貓熊入住。往後甚至有地方政府提議，讓貓熊以巡迴展出的方式，令各方均可獲利。⁷²

再則，經歷了政黨輪替，首次執政的民進黨採取不與中國大陸合作的立場，也令貓熊來臺所涉及的政治問題被各界討論。在前三次申請案中，政治問題存在於兩岸之間；在第四次申請案的討論過程中，國民黨及民進黨對兩岸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使得關於貓熊來臺的政治問題愈趨複雜。在 2004 年總統選舉中失利的國民黨，在兩岸政策上傾向於擴展和中國大陸政府之間的合作，聯合在臺北市執政的國民黨籍市長馬英九，積極推動貓熊來臺；相反地，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則視貓熊為在野黨和中國大陸的政治工具。相較於保育議題，貓熊來臺爭議所突顯的政治角力，更被媒體及民眾關注。

二、第四次申請案的討論歷程

針對第四次申請案，彼時媒體分析道，「中國大陸想打統戰的貓熊牌、臺灣以國際保育形象為由等複雜政治因素，讓貓熊來臺路迢迢」。⁷³ 陸委會亦強調，貓熊來臺涉及 CITES 及「中華民國野生動物保育法」等規定，主委吳釗燮並指出「如果是藉此要矮化臺灣，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我們不會接受」。⁷⁴ 傳達出民進黨政府在兩岸關係及國際公約方面的疑慮。

e/d/1ZduCpuOG8Bnsz8Ci5bCPpdL1uPjze6RA/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董會峰、曾嘉，〈臺灣六福村熊貓館完工，盼大熊貓早日入住〉，《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⁷² 第四次申請案除了臺北市立動物園申請貓熊輸入外，位於新竹的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同樣提出申請，農委會將兩案併案處理。同時，臺中市政府亦有意爭取貓熊，陸委會卻阻擋臺中市派出的防疫所長和國民黨智庫、臺北市立動物園代表一同前往四川參加大貓熊研討會。參見金武鳳、黃國樑，〈熊貓研討 陸委會不准中市登陸 中市派防疫所長與國民黨智庫隨行 胡志強對陸委會阻擋大感不解〉，《聯合晚報》，2005 年 8 月 26 日，第 14 版／綜合新聞。即使在第四次申請案被否決後，彼時的臺中市市長胡志強仍表示，臺中市仍會按照既定程序引進大貓熊，如果順利爭取到大貓熊來臺中，臺中市政府願意與臺北市輪流飼養，先到臺中兩年，之後再到臺北市。參見煒娜，〈臺灣民眾對熊貓被拒表示遺憾〉，《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⁷³ 王慧美，〈統戰？保育！臺灣曾 3 次拒貓熊〉，《聯合晚報》，2005 年 4 月 28 日，第 3 版／話題新聞。

⁷⁴ 黃雅詩、李順德、劉永祥，〈反應 熊貓統戰？府院黨「再觀察」陸委會：牽涉的問題不是那麼單純…先看胡怎麼說再回應〉，《聯合報》，2005 年 4 月 29 日，第 A5 版／連戰和平之旅；劉永祥、李光儀，〈陸委會：若矮化臺灣 不接受 馬英九指「城市間有什麼好矮化的」〉，《聯合報》，2005 年 5 月 3 日，第 A5 版／話題。

此時，臺北市長馬英九積極促成貓熊來臺，由副市長葉金川擔任貓熊小組召集人，全力建設軟硬體設備，爭取其入住臺北市立動物園。⁷⁵ 然而，動物園於 2005 年 10 月備妥文件提出申請案，但由於事涉敏感，臺北市政府高層態度低調，避免此時發言觸動中央政府、臺北市與其他縣市的政治角力。⁷⁶ 對此，農委會林務局副局長李桃生表示，臺北市立動物園若通過第一階段審查，林務局將核發許可文件，供園方向大陸申請 CITES 出口許可證明，第二階段將再審查動物園是否取得可合法輸入大貓熊的證明文件，以及園方是否確實具有永久照顧大貓熊之能力，「若北市動物園沒有完善規畫內容，審查小組不會輕易放行」，堅持大貓熊來臺案應依據法律、保育原則進行審查。⁷⁷

2006 年 1 月 6 日，陸委會與中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簡稱國臺辦）皆舉行記者會，宣布遴選出兩頭貓熊贈予臺灣。農委會則對此表示，沒有臺灣核發的輸入許可證，大陸不能宣布送貓熊到臺灣。⁷⁸ 農委會官員私下對媒體透露，上級政府交待對待此事愈低調愈好，「最好找到不讓熊貓進口的理由」。⁷⁹ 隨後，在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中，牠們被觀眾投票命名為「團團」和「圓圓」。在專家小組的審議之前，總統陳水扁透過《阿扁電子報》公開反對貓熊來臺，更援引潘文石《呼喊春天》一書對野生貓熊生活的描寫，暗示貓熊圈養和來臺展出不符保育精神。⁸⁰ 至

⁷⁵ 范凌嘉，〈迎賓 北市熊貓小組啟動「軟硬兼施」年底蓋好新光特展館 並派員到國外受訓 明年初讓熊貓進住〉，《聯合報》，2005 年 5 月 5 日，第 A7 版／話題。

⁷⁶ 陳志豪、馮復華，〈爭取熊貓來臺 市府低調送件 避免政治角力 以動物園名義提出 等農委會點頭 從送件到核准檢疫 可能需半年〉，《聯合報》，2005 年 10 月 6 日，第 C2 版／北市要聞。

⁷⁷ 孟祥傑、李玉梅，〈熊貓登臺審查 先丟 8 大疑問 北市貓熊館預訂明年初完工 農委會限期補送園養資料擇期再議〉，《聯合報》，2005 年 11 月 17 日，第 C5 版／大臺北。

⁷⁸ 賀靜萍，〈熊貓贈臺 陸委會批統戰「好像我們非接受不可，十分不尊重臺灣」 農委會最遲 3 月 23 日決定能否來臺〉，《經濟日報》，2006 年 1 月 7 日，第 A6 版／兩岸財經。

⁷⁹ 孟祥傑、李名揚，〈不讓熊貓來「上面交待找理由」 農委會下令 林務局副局長統一口徑：審查中 若放行可能給六福村〉，《聯合報》，2006 年 1 月 10 日，第 A4 版／要聞。

⁸⁰ 秦富珍，〈扁讀書心得拒熊貓 藍批政治干預 張榮恭：扁看書、看電影常常看偏了 指扁不是熊貓不要替熊貓代言〉，《聯合晚報》，2006 年 3 月 23 日，第 4 版／焦點話題；潘文石在臺出版的《呼喊春天：貓熊虎子與我》（2006）一書與在中國大陸出版之《熊貓虎子》（2005）內容大體相同。這是一本具有青少年科普色彩和文學性質的書，用擬人化的方式，以貓熊受人類活動（包括科學研究）影響下的命運作為主線，描寫牠們的生存現況及相關問題。針對陳水扁的表態，「中國評論新聞網」於 2006 年 3 月 24 日發表〈潘文石支持熊貓贈臺 扁曲解《呼喊春天》〉報導，負責這本書的遠流出版社主編林皎宏表示，「在和潘文石接觸出版事宜時，潘文石本人贊成圈養熊貓留在動物園的，也贊成熊貓到臺當親善大使」。據報導，潘文石不贊成經由人工繁殖、圈養長大的貓熊，輕易進行野放。但是，在「潘文石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的時候，就曾呼籲臺當局應拋開政治成見，讓熊貓早日入島」。參見中評社香港 3 月 24 日電，〈潘文石支持熊貓贈臺 扁曲解《呼喊春天》〉，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docid=100114987>），最後檢索日期：2019.11.24。

此，反對大貓熊來臺的民進黨執政之中央政府，和以臺北市政府為代表的在野黨（國民黨）持相反意見的情勢已很鮮明。申請案接近尾聲之時，農委會副主委李健全強調，雖然臺灣不是 CITES 簽約國，但需要接受公約第十條的規定，且依據「國與國」的關係處理，文件上一定要以「中華民國臺灣」顯示。⁸¹

就保育面向而論，決策官員在第四次申請案中表示，大貓熊來臺需透過保育團體討論及政府機關評估才能定案，於是召開項目審查小組會議及座談會，開放民間團體參與。針對第四次的申請案，保育團體基於六點考量，認為貓熊不適合輸入臺灣：（1）貓熊保育，應該以棲息地復育為主；（2）野外貓熊數量未達到需要圈養的程度；（3）臺灣人工飼養環境不及大陸好，且圈養貓熊都有刻板行為；（4）圈養貓熊的成本過高；（5）現有的貓熊生態研究已有很多，不需要重複研究；（6）贈送及圈養貓熊皆為負面的生命教育。

保育團體一方面重提夏勒之建議，讓政府出資、貓熊在大陸「就地認養」。⁸² 另一方面，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聯合教育、和平與生態保育團體（人本教育基金會、高雄市教師會生態教育中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及臺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長達四年的對臺灣動物園熊科動物之調查證據，控訴動物園並無妥善照料動物，實為空有「教育」名義的「娛樂機構」。⁸³ 人本教育基金會亦在期刊中，以專文提出意見。⁸⁴ 至此，第四次申請案得到臺灣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⁸¹ CITES 第十條內容如下。Article X: Trade with States not Party to the Convention. "Where export or re-export is to, or import is from, a State not a Party to the present Convention, comparable documentation issu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in that State which substantially conforms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for permits and certificates may be accepted in lieu thereof by any Party." 此處亦可參考 2008 年底之媒體報導，"although within the UN framework Taiwan is treated as a province of China and is not a signatory to CITES, it is following CITES regulat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as Taiwanese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pproved the documents, which reportedly list the Taipei Zoo and Wolong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Office." 參見 "PANDA DIPLOMACY: CITES secretary says panda transport need not be reported," *Taipei Times*, December 24, 2008, <http://www.taipe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8/12/24/2003431927> (accessed November 24, 2019); 鄭任汶，〈貓熊來臺已破局〉，《聯合晚報》，2006 年 3 月 24 日，第 6 版／寰宇話題。

⁸² 傅啟倫，〈保育團體：大陸貓熊宜就地認養 建議北市出錢將貓熊託養在四川 給予更好的照顧〉，《中央日報》，2005 年 10 月 17 日，第 6 版／兩岸三地。

⁸³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動物園要逼多少動物發瘋！才夠？誰來關心臺灣已發瘋的「肖熊」〉，新聞稿，2005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east.org.tw/action/1106>），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⁸⁴ 史英，〈我們不該養貓熊〉，《人本教育札記》，第 191 期（2005），頁 2-3。

農委會召集十三位來自相關部門、保育生物學及動物醫學界之學者、保育團體等各界專家組成審查小組。受邀但不克參加審查會議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員劉小如指出，顯然許多「非生物相關」的考量「是決定是否能合法引進大熊貓的主因」，並以其專家身份表態，「臺灣引進大熊貓的先決條件是不可動用任何公部門的經費或設施……公部門能用在生物多樣性保育上的經費極為有限，此部分資源應該完全用在本土生物的保育、研究、及推廣教育上」，對於將年輕、健康、有繁殖能力的貓熊引進臺灣，持明確的反對意見。⁸⁵ 最終，項目小組認為，國際對貓熊保育已有共識，應該以「域內保育」以及研究牠們的野外生態習性為主；另一方面，申請者之教育計劃及飼養貓熊之設備和人才訓練尚未成熟。2006 年 3 月 31 日，農委會否決申請案。⁸⁶ 農委會決議亦表示，若上述問題如能改善，且取得保育團體支持之共識，則貓熊當可依規定輸入。

三、第四次申請案被「否決」後之爭議

面對農委會決議，貓熊來臺召集小組葉金川回應，「無法接受以保育之名掩飾政治干預熊貓來臺」、「貓熊來臺是早晚的事」，不排除未來 2008 年政黨輪替之後，再邀請貓熊來臺。⁸⁷ 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亦表示，「本來以為這次可成功，但好像還是不行，氣氛看起來好像還不對」。⁸⁸ 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臺灣促進和平文教基金會等多個機構則進行連署，向農委會遞交陳情函，就法律、法治、保育和國際關係等面向提出進一步改善貓熊來臺審查機制的建言。⁸⁹

另一方面，臺北市立動物園不服決議，提出訴願。⁹⁰ 訴願內容聚焦於對「保育」的詮釋、民主程序的正當性，還有以民眾為對象的「保育教育」(conservational

⁸⁵ 引文即稱該物種為「大熊貓」。劉小如，〈致「大熊貓案審查會議」〉信函，2006 年 3 月 30 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fBXr5wYEgwrRqU82NOcUntQQv3x-Nfg/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⁸⁶ 于曉亮，〈大熊貓赴臺之路還有多遠？〉，《人民日報海外版》，2007 年 1 月 16 日，第 3 版。

⁸⁷ 尚毅夫，〈蘇揆：尊重專業 沒下指導棋 藍委對審查結果很不滿 指阿扁電子報直接影響審委〉，《聯合報》，2006 年 4 月 1 日，第 A5 版／話題；徐蕾，〈臺灣當局怕什麼？〉，《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 年 4 月 3 日，第 3 版。

⁸⁸ 范凌嘉，〈熊貓來臺 馬：不樂觀「圈養的合乎華盛頓公約 但總統已跳出來反對」〉，《聯合報》，2006 年 3 月 28 日，第 A13 版／兩岸。

⁸⁹ 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等，〈陳情函〉，受文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6 年 11 月 9 日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7ED4j0kQ4KuP9W66mKMH6ZfCV2WnOl6/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⁹⁰ 本次由臺北市立動物園提出的訴願，以原處分機關未將項目審查小組之審查結果送交野生動物保育諮詢

education) 等面向。⁹¹ 首先，原處分機關（農委會）組成之項目審查小組指出，「本案應依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及野生動物保育法規定辦理」，貓熊輸入將違反 1992 年「全球生物多樣性公約」及 1993 年之《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⁹² 此外，申請書在「保育教育」計劃、飼養設備及人才訓練方面皆尚有不足。其次，項目小組強調貓熊為 CITES〈附錄一〉物種，亦「屬依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之瀕臨絕種保護類野生動物，為國際間保育的象徵與指標，甚受國際矚目及國人關注」。

行政院決定書回應，為慎重處理，項目小組之成員「包括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且以政府外部之學者專家為多數，成員多元，符合民主的正當性」。強調本次申請案之審查結論，應被予以尊重。⁹³

然而，臺北市立動物園不服訴願決定，繼而提起行政訴訟，其爭議點亦在於保育手段。⁹⁴ 動物園援引與審查小組所引用之相同的國際公約及《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加上農委會編印之生物多樣性研討會材料等，強調「域外保育」在物種絕種危機、控管圈養數量及野生動物保育數量，以及公共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動物園認為農委會就本案之處理和其他同為 CITES〈附錄一〉物種

委員會討論及確認，違反「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五條規定，程序上有重大瑕疵為由。臺北市立動物園於 2006 年提出訴願後，行政院於同年 12 月 29 日發出行政院決定書。其後，臺北市立動物園不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於 2008 年 3 月 27 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行政院決定書，決定書字號：0950095379，案由：臺北市立動物園因申請輸入大貓熊事件，訴願人：臺北市立動物園，2006 年 12 月 29 日 (<https://www.east.org.tw/sites/east/files/content/upload/File/3-61-1.pdf>)，頁 10-12，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 年度訴字第 00718 號，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2008 年）3 月 27 日，裁判事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96%2c%e8%a8%b4%2c718%2c20080327%2c1>)，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⁹¹ 「保育教育」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教育或宣傳活動，而是專指動物園發揮其對遊客在生態保育、生物多樣性、物種保存等方面可能產生的教育功能。是目前世界公認的現代動物園的核心使命之一。

⁹² 《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The World Zoo Conservation Strategy*, 簡稱 WZCS) 由 1993 年「國際動物園園長聯盟」(又稱為「國際動物園管理者聯合會」, International Union of Directors of Zoological Gardens, 簡稱 IUDZG, 於 2000 年更名為「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 World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簡稱 WAZA) 出版。自 1990 到 2010 年代間，共計出版了三版的《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以各種語言發行。第一版（1993）和第二版（2005）由臺北市立動物園負責翻譯；第三版則由中國大陸相關機關負責發行。第三版的《世界動物園保育方略》是由 IUDZG 和 IUCN 之物種存續委員會的「保育繁殖專家群」(Conservation Breeding Specialist Group, 縮寫為 CBSG) 內的專家研擬，並由全球國家級或區域級之動物園及水族館共同制定。目的在表明動物園及水族館在全球保育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回應全球自然保育與永續發展在 1970 年代 IUCN 出版《世界保育方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的倡議。

⁹³ 行政院決定書，決定書字號：0950095379，案由：臺北市立動物園因申請輸入大貓熊事件，訴願人：臺北市立動物園，2006 年 12 月 29 日。

⁹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 年度訴字第 00718 號，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2008 年）3 月 27 日，裁判事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之輸入案有所不同，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先例。⁹⁵ 最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原告之訴駁回。⁹⁶

然而，究竟是政府以保育為理由，掩飾政治考慮，還是保育的重要性和專業性被政治干預？兩年以後，政黨再次輪替，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當選後，立即著手安排貓熊來臺事宜。

陸、「團團」、「圓圓」到臺灣——第五次輸入申請案（2008）

一、第五次申請案提出的背景和歷程

2008 年 3 月 22 日，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馬英九表示，歡迎大貓熊到臺灣居住。⁹⁷ 隨後，臺灣多家媒體即刊登各地動物園參與爭取大貓熊入住的新聞。臺北市長郝龍斌於 25 日帶領記者前往臺北市立動物園，首度對外公開「貓熊館」（即前述之「新光特展館」）。「大貓熊來臺」被廣泛認為已不存在任何困難。馬英九於同年 5 月 20 日就職總統後，媒體已不再關注大貓熊「是否」來臺的問題，轉而討論牠們將何時抵臺、落戶何處的問題。「中廣新聞網」更指出，預計該年度之下半年，大貓熊就能和民眾見面。⁹⁸

同年 6 月，臺北市立動物園向農委會提出第五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6 月 3 日，原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出任海協會會長，表示將在兩岸兩會會談中，討論大貓熊來臺

⁹⁵ 臺北市立動物園在行政訴訟中指出，同為 CITES〈附錄一〉之物種的亞洲水獺（2005 年輸入）及長臂猿（2007 年輸入），均「未」依規定組成項目審查小組，大貓熊輸入案卻需經過項目小組之審核，此違反平等原則及行政先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96 年度訴字第 00718 號，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2008 年）3 月 27 日，裁判事由：野生動物保育法。

⁹⁶ 在第四次申請案中，臺灣亦有提議「大貓熊進島要暫居日本」，在當地居住滿六個月後，由「第三國」出具檢疫證明，才能申請到臺灣。其原因是，依據臺灣法律規定，大陸地區乃是狂犬病疫區，動物不得直接由大陸輸出到臺灣。相關報導指出，如果日本算是「第三國」，那麼隱含著臺灣以「第二國」自居，乃是暗中強調大貓熊來臺是「國與國之間贈送」的政治含義。參見聶傳清，〈熊貓赴臺路崎嶇（特別報導）〉，2005 年 6 月 8 日，第 3 版。

⁹⁷ 木白，〈大熊貓有望赴臺了〉，《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

⁹⁸ 轉引自張綺珏，〈臺灣地區動物園管理、教育與動物福利議題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93。

的日程問題。⁹⁹ 6月下旬，郝龍斌赴上海訪問，其中的重要工作就是為臺北市立動物園爭取大貓熊和金絲猴。¹⁰⁰ 7月15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稱研考會）隨即進行「民眾對大陸貓熊來臺的看法」之電話民意調查，並且在一星期之後公佈結果「5成6民眾贊成大陸貓熊來臺，近3成1民眾認為貓熊來臺最佳時機是今年年底前」。¹⁰¹ 保育團體對此批評道，「從問卷設計到公布時機等，政治操作非常明顯」。¹⁰²

迥異於第四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農委會林務局於2008年8月14日召開「大貓熊專案審查小組」會議審查申請案，核准臺北市立動物園進口大貓熊，但宣稱因為「擔心委員受到不必要的壓力與干擾」，不願在會前透露專家小組的成員、人數與組成。對此，民進黨及民間團體呼籲信息應該符合透明及公開的民主考慮，但皆未獲正面響應。討論過程中，國民黨籍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大家都當不懂，也就進來了，要是大家都成為專家，一直鑽研研究，當然就會變得很嚴重」。¹⁰³ 一名保育專業人士透過媒體表示，「上次審查時持反對意見者，這次即未獲邀請，懷疑林務局已預設立場，不用審就知道將核准熊貓來臺」，突顯彼時政府極力促成大貓熊早日來臺的意志。¹⁰⁴

然而，按照CITES第三條第三項規定，「〈附錄一〉所列任何物種標本之輸入，應先經核准並提出輸入許可證及輸出或再輸出許可證」。¹⁰⁵ 然而，大陸不以公約之所謂「國對國」簽署出口證明書給臺灣。於是，中央政府想方設法創造各種

⁹⁹ 《中廣新聞》，2008年6月3日。轉引自張綺珏，〈臺灣地區動物園管理、教育與動物福利議題研究〉，頁94。

¹⁰⁰ 《華視新聞》，2008年6月10日。轉引自張綺珏，〈臺灣地區動物園管理、教育與動物福利議題研究〉，頁94。

¹⁰¹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5成6民眾贊成大陸貓熊來臺〉，新聞稿，2008年7月22日（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C09570BF137950A2#），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¹⁰²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貓熊案重要聲明——呼籲政府落實民主、透明審議、公開辯論〉，新聞稿，2008年8月13日（<https://www.east.org.tw/action/1245>），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¹⁰³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魔鬼藏在哪個細節裡？把貓熊當中藥？讓陳雲林夾帶（走私）來臺嗎？馬「總統」，臺灣還是個國家嗎？〉，新聞稿，2008年9月17日（<https://www.east.org.tw/action/1248>），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¹⁰⁴ 鄭智仁，〈熊貓落腳 最快下週四定案〉，《蘋果日報》，2008年8月9日，第A6版／要聞。

¹⁰⁵ CITES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輸入許可證僅於符合下列條件時發給：a. 輸入國之科學機構曾經通告此項輸入之用途並不危害有關物種之生存；b. 輸入國之科學機構查明一活體標本之接受者，具有適當設備，以安置及看管該標本；c. 輸入國之管理機構查明該標本不用於偏重在商業上之目的」。

大貓熊來臺的方法，如「贈送模式」、「中藥進口模式」，以及隨陳雲林來臺的「包機走私模式」等。值得注意的是，各種模式皆有損法治、生態保育、動物福利和生命教育，因而備受批評。¹⁰⁶ 實際上，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以不符合規定的方式將大貓熊走私進入臺灣，政府有權以銷毀等方式處理。¹⁰⁷

必須留意的是，依「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細則」的規定，必須檢附由中國大陸政府核發的「CITES 允許進出口證明書」，或者「野生動植物允許進出口證明書」等相關資料。實際上，民進黨首次執政時期，為了因應中藥材業者的實際需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 2002 年 7 月 1 日公告進口 CITES〈附錄一〉、〈附錄二〉物種之貨品，應憑上述之兩種證明書擇一辦理。¹⁰⁸ 然而，當民進黨政府傾向否決申請案時，透過「野生動植物允許進出口證明書」接受貓熊來臺的可能性，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視。最終，「團團」、「圓圓」正是以檢附「野生動植物允許進出口證明書」獲准進入臺灣。對證明書上載之從「四川成都」到「臺灣臺北」，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表示其為「進出口口岸」，並不涉及國家名稱問題。李桃生則強調，「輸入文件是依循行政慣例，在兩岸完全對等、無矮化臺灣的情況下完成」，與他本人在第四次申請案審查時的表達有所出入。¹⁰⁹ 保育團體則指出，兩岸刻意迴避 CITES 規範的「國與國」貿易所需要的輸出、輸入許可等規定。臺灣除了自我矮化外、接受瀕臨絕種動物作為「贈品」，也有損臺灣在國際的保育工作和形象。¹¹⁰

二、第五次申請案之爭議

¹⁰⁶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魔鬼藏在哪個細節裡？把貓熊當中藥？讓陳雲林夾帶（走私）來臺？馬「總統」，臺灣還是個國家嗎？〉，新聞稿，2008 年 9 月 17 日。

¹⁰⁷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申請首次輸入非臺灣地區原產之野生動物物種者，應檢附有關資料，並提出對國內動植物影響評估報告，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輸入」。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三項「違反本法之規定，除前項規定者外，查獲之保育類野生動物與其產製品及供違規所用之獵具、藥品、器具得沒入之。前項沒入之物，必要時，主管機關得公開放生、遣返、典藏或銷毀之。其所需費用，得向違規之行為人收取」。

¹⁰⁸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發文字號：貿服字第 0910150408-0 號，2002 年 7 月 1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59w2VqaasX9L0M8Hd4_juy0QBvY9NjU/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¹⁰⁹ 蘇永耀等，〈貓熊來臺華盛頓公約：「屬國內交易」 綠批馬賣主權〉，《自由時報》，2008 年 12 月 17 日，第 A6 版／政治新聞。

¹¹⁰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魔鬼藏在哪個細節裡？把貓熊當中藥？讓陳雲林夾帶（走私）來臺？馬「總統」，臺灣還是個國家嗎？〉，新聞稿，2008 年 9 月 17 日。

第五次申請案不同於前四次申請案之處，在於其由中央政府主導，不僅存在國際公約及法律爭議，還被指控存在疑似官商利益交換的不法情事，以及民主、法治等一系列問題，其間所引發的爭議面向更廣，問題更為複雜。以 CITES 為例，在前幾次申請案中，政府多次強調大貓熊的輸入有違反 CITES、引發貿易制裁的風險。然而，對於第五次申請案，不僅政府一味迴避該問題，CITES 秘書處也表示貓熊來臺屬中國「國內交易」(internal / domestic trade)，不介入兩岸的政治問題。¹¹¹ 這樣一種刻意忽視爭議的態度，突顯了「政治」足以影響「保育的專業性」，「政治目的」足以左右「對保育的詮釋」。

對比第四次、第五次申請案，農委會林務局的審查標準不一。面對第四次申請案，農委會認為貓熊保育「應轉移至野外動物生態習性及棲息地保育研究」及「配合國際保育主流價值，強調在地保育」，而且應「取得保育團體支持之共識」。當臺北市立動物園提出訴願和行政訴訟時，農委會亦使用上述之保育理由來主張行政處分的合理性。然而，在第五次申請案中，農委會完全忽略上述問題，僅針對申請者的「飼養場所」、「醫療照護」及「教育及學術研究計劃」等項目進行審查。再則，申請書中的「保育教育方案」與第四次申請案大體相同，第五次申請案的審查小組卻不僅沒有與動物園展示教育和「保育教育」相關的專業委員，也忽視了第四次申請案受到否決的原因之一，「展示及加強野生動物保育之教育計畫不夠具體」未被充分改進。¹¹²

進一步而論，在第五次申請案的討論過程中，動物園自行評估，在大貓熊來臺後，每年入園遊客將由固定三百萬人次增加到五百萬人次，且園方網站已開始販賣相關商品，臺北市政府同樣推出各種旅遊消費配套方案，其著眼是大貓熊所帶動的

¹¹¹ “PANDA DIPLOMACY: CITES secretary says panda transport need not be reported.” 蘇永耀等，〈貓熊來臺 華盛頓公約：「屬國內交易」 綠批馬賣主權〉，2008 年 12 月 17 日，第 A6 版／政治新聞。

¹¹² 此為筆者對〈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檢舉『農委會』違法、失職」以及「檢舉臺北市政府圖利特定廠商理由」之彙整。參見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動社研字 97 年第 023 號，2008 年 12 月 4 日（<https://www.east.org.tw/sites/east/files/content/upload/File/3-61-2.pdf>），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李桃生雖撰文反駁兩次申請計畫書之「保育教育方案」大同小異之質疑，但相較於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的指證，仍欠缺說服力，參見李桃生，〈細說大貓熊輸入〉，《臺灣林業》，第 35 卷第 2 期（2009），頁 64。

商業利益。基於以上事實，保育團體認為林務局核准本次申請案違背 CITES 第三條第三項 c 規定，〈附錄一〉物種「不用於偏重在商業上之目的」。¹¹³

在本次審查中，審查小組的組成亦有頗大變化。在第四次申請案的審查小組內，與保育及野生動物研究領域相關的專家代表，在十三席中占八席（62%）。然而，第五次申請案的審查小組僅有七人，除農委會代表一人以外，六位專家之研究專長和野生動物生態較為相關的僅有三位，比例明顯被刻意減少。而且，一位審查小組委員與動物園園方似有利益衝突，卻未迴避。¹¹⁴

因此，EAST 批評申請案「審查不透明、信息不公開」，且指控政府圖利廠商，以及臺北市政府、動物園、動物園之友協會和新光集團的互利關係。首先，大貓熊輸入申請案既非國防、軍事、外交機密，但林務局卻在審查會議舉行前，拒絕公開小組名單及會議，有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之嫌。¹¹⁵ 其次，新光集團取得「特展館」命名權的過程，亦有政府圖利特定廠商之嫌。¹¹⁶

因應政府核准第五次申請案後的社會議論，李桃生發表〈細說大貓熊輸入〉一文，以「說明並資澄清」問題。然而，該文卻未具體回應租借、租金，以及大貓熊之所有權等問題。李桃生在涉及 CITES 的相關內容中，未談兩岸之間地位問題的重要爭議、輸出及輸入 CITES 〈附錄一〉物種的相關規定，以及禁止以商業為目的之輸出及輸入行為。相反地，他強調「大貓熊的輸入，是法律適用的問題、是專業

¹¹³ 此為筆者對〈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檢舉『農委會』違法、失職」以及「檢舉臺北市政府圖利特定廠商理由」之彙整。CITES 第三條第三項 c 規定原文如下。Article III 3. (c) a Management Authority of the State of import is satisfied that the specimen is not to be used for primarily commercial purposes. CITES Convention Treaty Articles II-IV. 參見“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1973, <https://cites.org/eng/disc/text.php#X> (accessed November 14, 2019).

¹¹⁴ 此為筆者對〈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檢舉『農委會』違法、失職」以及「檢舉臺北市政府圖利特定廠商理由」之彙整。

¹¹⁵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動社研字 97 年第 023 號，2008 年 12 月 4 日。

¹¹⁶ 筆者彙整〈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如下：臺北市政府有圖利特定廠商取得「新光特展館」永久命名權之嫌。由於貓熊將帶來巨大的媒體曝光和廣告機會，以美國的命名權利金經驗，最昂貴者一年高達三億元，平均值是一年約八千萬元。臺北市政府卻逕自將大貓熊館的永久命名權，僅以三億元私相授予新光集團。此外，臺北市立動物園之友協會，是由新光集團自行成立的民間團體。新光集團捐助鉅額給予動物園之友協會，恐涉及逃稅牟利。動物園之友協會之登記地點就是動物園現址，副園長更擔任協會理事，其運作與動物園實為一體。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動社研字 97 年第 023 號。

的問題、是技術層面的問題」。¹¹⁷ 由此可見，其對於所適用的「法律」、「專業」、保育問題的專業性，以及「技術」的內容，呈現出特定的偏好。

對於來自保育團體的質疑，林務局無論是在國際公約或國內法規的相關問題上，皆以迴避爭議的方式忽略不談。第五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似乎在有違保育原則及程序規定的情況下通過。其後，EAST 對農委會發起「政府資訊公開法」官司，但在法院判定農委會之專案審查會議，「沒有會議紀錄，因而無法提供」的情況下敗訴。¹¹⁸ 面對彼時政府接受大貓熊來臺的意志，申請案成為一個在政治和經濟考慮下，被批評為是披上了保育外衣的「民主問題」。¹¹⁹

透過對第四次和第五次申請案之比較，可以見得「何謂保育」及「如何保育」的問題，在不同的時空中，是由政治目的決定對其的詮釋方式。透過對第五次申請案的分析，將發現保育議題足以成為政治議題，政治立場更足以影響保育立場。「保育」和「政治」亦可能相互掩護、互為托詞。

¹¹⁷ 李桃生，〈細說大貓熊輸入〉，頁 61。

¹¹⁸ 筆者將 EAST 要求農委會依法公開會議紀錄而發起之「政府資訊公開法」官司過程整理後，簡述如下。EAST 針對此次輸入申請案之審議，於民國 97 年（2008 年）8 月 19 日申請〈提供政府資訊申請書〉，並於同月 27 日收到農委會回函。農委會回函指出，「有關審查會議紀錄部分，……（中略）本會未便提供」。隨後，EAST 不服，於民國 97 年（2008 年）9 月 16 日提起訴願。針對此訴願，臺灣行政院決定書於民國 98 年（2009 年）3 月 17 日發出，表示「所訴核不足採，原處分應予維持」。隨後，EAST 不服行政院訴願決定，又於民國 98 年（2009 年）5 月 11 日提行政訴訟。農委會隨後於民國 98 年（2009 年）6 月 15 日發出答辯狀（行政訴訟陳報狀）。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同年發出的判決書指出，「（本次輸入申請案之專案審查會議）僅有會議結論而無書面會議紀錄，被告自無此會議紀錄得予提供」。參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書，98 年度訴字第 938 號，民國 98 年 10 月 29 日辯論終結，裁判日期：民國 98 年 11 月 12 日（<https://law.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BA,98%2c%e8%a8%b4%2c938%2c20091112%2c1>），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其後，EAST 又於民國 98 年（2009 年）12 月 17 日，提出行政訴訟上訴理由狀。農委會相應於民國 99 年（2010 年）2 月 11 日發出答辯狀。經最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2012 年）2 月 17 日判決，駁回上訴。參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101 年度判字第 171 號，裁判日期：民國 101 年 2 月 16 日（https://law.judicial.gov.tw/LAW_MOBILE/FJUD/data.aspx?ty=JD&id=TPAA,101%2c%e5%88%a4%2c171%2c20120216%2c1），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¹¹⁹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貓熊案重要聲明——呼籲政府落實民主、透明審議、公開辯論〉，新聞稿，2008 年 8 月 13 日。

龍緣之／大貓熊來臺「團圓」史——1988 至 2008 年的大貓熊輸入申請案

申請案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時間	1988	1989.9-1990.9	1991.3	2005-2006.4	2008.6-2008.8
行政院長	俞國華 (國民黨)	李煥、 郝柏村 (國民黨)	郝柏村 (國民黨)	謝長廷、 蘇貞昌 (民進黨)	劉兆玄 (國民黨)
申請者	臺北市立動物園之友協會	臺北市立動物園之友協會	臺北市立動物園之友協會	臺北市立動物園、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臺北市立動物園、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政務官 (決策官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引進大貓熊涉及直接貿易，違反「三不」政策。 2. 應考慮是否符合國際公約、保育技術。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需由「第三國」核發 CITES 的輸出許可證。 2. 依 CITES 瀕臨絕種及珍稀動物不得商業展示。 3. 恐影響臺灣保育聲譽。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至少要有二公四母才可能繁殖成功。 2. 需飼養環境、人力、財力配合。 	大貓熊來臺必須透過保育團體討論及政府機關評估才能定案。	<p>研考會主動公佈民調，5 成 6 贊成大貓熊來臺，6 成認為有助臺灣觀光；4 成 7 認為可促進兩岸和諧。</p>
事務官 (幕僚)	收集國際保育組織意見，認為臺灣不適合進口大貓熊。	邀請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學者贊成、反對皆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召開項目審查小組會議，委員名單公開。 2. 召開座談會，開放民間團體參與。 	審查會議前，林務局拒絕公佈審查小組委員名單。

【表一】歷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之多方意見彙整

申請案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審議學者	1. 應將經費、人力，優先用於解決臺灣的野生動物保育問題。 2. 臺灣動物專家可提供最佳飼養環境，藉此改善國際形象。	飼養、養得活大貓熊不是問題，繁殖才是問題。		1. 國際對其圈養生態已具研究成果，應轉為研究野外生態習性及「域內保育」之研究。 2. 應以大貓熊在其自然棲息地的保育為主。	審查會議前，林務局拒絕公佈審查小組委員名單；審查會議亦「無會議紀錄」，故不得而知
保育團體 (NGO)	(國際團體) 1. 若大貓熊來臺，WWF 將對臺灣制裁。 2. 大貓熊不能展示、營利，僅能作繁殖目的。 3. 必須為動物園圈養的第二代才可贈送他國。 4. 接受老的、脾氣孤僻不負繁殖任務的大貓熊來臺。	夏勒支持臺灣投入大貓熊保育研究，但反對放在動物園展示及研究繁殖。		(臺灣團體) 1. 應以大貓熊在其自然棲息地的保育為主，而非「域外保育」。 2. 野外大貓熊數量未達需圈養的程度。 3. 臺灣人工飼養環境不比大陸好，圈養大貓熊都有刻板行為。 4. 圈養大貓熊成本過高。 5. 現有大貓熊生態研究很多，不需重複研究。 6. 贈送、圈養大貓熊皆為負面的生命教育。	(臺灣團體) 未受邀參與討論。
結果	否決 (1988 年 12 月 8 日)	否決 (1990 年 9 月)	否決 (1991 年 3 月)	否決 (2006 年 3 月 31 日)	核准輸入 (2008 年 8 月 14 日)

【續表一】歷次大貓熊輸入申請案之多方意見彙整

資料來源：本表由筆者改寫自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貓熊來不來 已不只是政治、保育及商業議題 更是民主問題！呼籲政府讓民眾充分瞭解資訊 透明審議、公開辯論〉，新聞稿附件〈歷次貓熊來臺申請案「產、官、學、民」意見彙整〉，2008 年 8 月 13 日。

柒、政治動物，抑或保育象徵

在近代歷史中，貓熊曾經被貼上「來自共產國家的動物」之標記，被拒絕進入美國；在兩岸關係裡，牠們無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團團」和「圓圓」搭乘專機抵達臺灣時，籠外覆蓋著寫有「認識新朋友，保育向前走」的標語，卻被媒體批評為一場保育去政治化的假象。¹²⁰ 實際上，在大貓熊來臺之初，大貓熊贈送儀式的相關報導率很低，而且在貓熊抵臺後，動物園推薦的多種參觀路線裡，大貓熊竟被歸於「遇見臺灣本土動物路線」中，或許正意味著動物園方刻意淡化其來自中國大陸的事實和該物種的政治色彩。¹²¹

透過人工授精方式繁殖的貓熊子代「圓仔」於 2013 年誕生後，臺灣的「貓熊熱潮」也正式被推向高峰。雖然「圓仔」誕生之初，臺灣媒體關注的焦點是動物的歸屬問題，但是動物園新聞聯絡人亦表示，相關報導逐漸轉向政治以外的其他面向。¹²²「圓仔」之名稱，除了是母獸「圓圓」所生之「仔」，也是花卉「圓仔花」及閩南語的「小湯圓」之意，帶有能被清楚辨識的本土氣質。既有研究也顯示，臺灣三大重要報紙（《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的「圓仔」相關新聞，皆不曾出現於「國際／兩岸」一類版別，足以見得媒體在大貓熊議題上，因著眼於貓熊的經濟效益，而對中國大陸及兩岸間政治議題的迴避。¹²³

究竟，保育與政治的關係為何？動物的展示如何強化了其中的政治性？貓熊的符號意義在本案例中有何獨特性，又引發了什麼樣的效應？再則，從保育觀和動物權思想出發，可提供什麼樣的對貓熊來臺的反省視角？

¹²⁰ 陳韋綸，〈歡迎團團與圓圓蒞臨重複行為者的寶島樂園〉，《破報·復刊》，542 號，2008 年 12 月 26 日-2009 年 1 月 4 日，第 16、17 版。

¹²¹ 朱孝芬、蘇美齡，〈大貓熊來臺相關行銷活動對媒體與社會大眾觀感探討〉，《動物園學報》，第 21 期（2009），頁 55-72；臺北市立動物園網站（<https://www.zoo.gov.taipei/>），最後檢索日期：2016.6.1。

¹²² 林秀穎，〈動物園行銷與媒體效果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圓仔」成長議題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頁 103。

¹²³ 林秀穎，〈動物園行銷與媒體效果之研究〉，頁 66。

首先，「貓熊來臺」意謂著牠們將被公權力主導的動物園所展示、被民眾觀看。除了因為貓熊所帶有的政治色彩，令民進黨立法委員李俊毅表示「禁止家人去看大貓熊」以外，實際上，動物園動物的展出，本身就是一種視覺與權力運作的結果。¹²⁴ 動物園不斷地強化遊客在被精密設計過的展場動線中，同時是動物園裡的觀看者（行使權力的一方），也是被制度所馴化的一方，久而久之接受了此種對待動物的方式，進而被納入這樣的「視覺－權力」結構。簡言之，「觀看什麼」和「如何觀看」的問題，在本案例中，不僅是對「保育」的詮釋進行政治角力的過程，更是政治和經濟考量下的結果，並反映了一種獨特的動物與人類關係。諷刺的是，這種關係正是以出自「非人類中心主義」(non-anthropocentrism) 立場的「保育」為名義。

因此，透過貓熊來臺的案例，應該被檢視的是：這裡所謂的「保育」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對何種動物（或生態、教育）利或不利的影響」？以及，本案例是否對「保育」概念被濫用的問題，帶來一定的警示？

在本案例中，貓熊作為全球保育「旗艦物種」之象徵性及其真正發揮的保育作用，受到多層面、程度不一的質疑。在貓熊抵臺之前，臺北市議員吳思瑤就指出，動物園「不該僅以衝高遊客人數為主要考量，本末倒置的結果形成 M 型動物園，不但將造成民眾對於動物價值的差別印象更忽略專業，資源排擠的情形下造成其他動物無形中的傷亡」。¹²⁵ 除了斥資興建的展出場館，「運輸和展場佈置、大貓熊食竹製作、飼善管理和醫療訓練、交流費用」等，花費近千萬元。臺北市政府每年更編列三千萬元投入大貓熊飼養、相關研究和保育工作。「團團」和「圓圓」成為臺北市立動物園「身價最高」的動物。¹²⁶ 然而，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則是同樣有著複雜的行為需求、其動物福利 (animal welfare) 應優先被考量的其他熊科物種在該動物園中的處境。2005 年起，保育團體公佈對臺北市立動物園內熊科動物的調查研究，指出動物福利不佳的問題。¹²⁷ 在貓熊抵臺前，布農族人亦表示，不如讓

¹²⁴ 馬淑靜，〈愛上大熊貓的一百個理由〉，《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 年 12 月 25 日，第 3 版。

¹²⁵ 〈M 型化動物園：廠商捐款、動物照護天差地遠〉，新聞稿，2008 年 4 月 11 日，臺北市士林北投議員吳思瑤部落格 (<https://rosalia0528.pixnet.net/blog/post/9605793>)，最後檢索日期：2020.4.27。

¹²⁶ 邱紹雯，〈貴客高身價 新家 2 億 每年開銷 3 千萬〉，《自由時報》，2008 年 12 月 23 日，第 A7 版／生活新聞。

¹²⁷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動物園要逼多少動物發瘋！才夠？誰來關心臺灣已發瘋的「肖熊」〉，新聞稿，2005 年 11 月 15 日。

動物園中的臺灣黑熊（Formosan black bear, 學名 *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回到原本生存的自然，享有尊嚴和原有的生存方式，政府也可由此節省一筆開銷。¹²⁸

其次，不同的物種在公費資源分配上的問題，從真實世界的動物處境，亦延伸到其各自的符號意涵。「圓仔」首度面向公眾展示當天，動物園迎來 6,8188 名遊客人次，創下十年來最高的單日入園人數。¹²⁹ 但是，其他物種的保育問題，卻沒有受到足以和「圓仔」相提並論的關注。這樣的現象引發保育團體的批評，認為政府、動物園和媒體藉著「圓仔」的誕生，著眼於政治和經濟效益，大力炒作貓熊熱潮。與此同時，包括臺灣黑熊、石虎（Leopard cat, 學名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臺灣帝雉（Mikado pheasant, 學名 *Syrnaticus mikado*）在內的本土物種，以一種反抗性的姿態，逐漸走入民眾視野。數十年以來，在世界各地的廣告及政治諷刺漫畫中，大貓熊常作為當代中國的表徵。¹³⁰ 而在利用「圓仔」進行政治、商業行銷的熱潮中，一系列臺灣本土物種的形象，則以一種反對貓熊及其象徵系統的對抗性姿態出現，並成功的喚起臺灣社會對本土物種保育的關注。其中，臺灣黑熊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符號。

在保育等級上，臺灣黑熊屬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也是臺灣唯一的熊科（Ursidae）動物，數量估計為二百至六百頭，較貓熊的個體數量更少。然而，臺灣黑熊在野外的確切數量及生存情況，至今仍不明確，二十年來的保育活動也缺乏政府支持，未受到來自社會的重視，引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專家及NGO的批評。¹³¹ 以創立於2010年的臺灣黑熊保育協會（Taiwan Black Bear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簡稱TBBCA）為例，即以「愛圓仔更要愛黑寶」等標語進行宣傳，同時配合在媒體上的文章發表、舉辦大眾講座等方式，成功地行銷了黑熊保育（造型為卡通化的臺灣黑熊「黑寶」

¹²⁸ 陳儀珊，〈與其留在臺北被糟蹋… 布農族：放黑熊回家〉，《自由時報》，2008 年 12 月 28 日，第 A8 版／生活新聞。

¹²⁹ 張玉琦，〈打造動物代言人圓仔創造吸晴與吸金效益〉，《經理人》，2014 年 12 月 4 日（<http://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0257>），最後檢索日期：2019.11.24。

¹³⁰ 亨利·尼可斯，《來自中國的禮物：大貓熊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頁 277。

¹³¹ 有臺灣「黑熊媽媽」之稱的著名黑熊專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黃美秀表示，相較於野外貓熊，臺灣黑熊不僅族群數量更讓人擔憂，其所面臨的持續威脅和困境，更是難以想像。究其原因，包括政府和民眾對於臺灣黑熊的保育承諾和行動不足、保育和研究的資源短缺、非法狩獵、野味和中藥市場持續發展等因素。綜觀過去二十年關於臺灣黑熊的各項保育經費，每年約二百萬元新臺幣，總計約四千三百萬元，相當於日本政府對其黑熊一年的經費挹注。參見黃美秀，〈從貓熊圓仔看臺灣黑熊保育〉，《天下雜誌》，2013 年 8 月 22 日（<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54>），最後檢索日期：2019.11.7。

是該協會的保育大使)。¹³² 關注石虎保育的文化創意團隊「石虎抱抱」(Hug Taiwan Leopard Cat)，也於2014年9月正式成立，定期發布石虎保育的相關資訊，介紹本土物種相關知識。¹³³

因此，與其認為「圓仔」的出生與臺灣本土物種的保育運動，是民眾基於對「旗艦物種」的關注，延伸為對其他物種的關懷，不如說，在「圓仔」熱潮中，臺灣本土物種是作為一種對抗性的政治符號而登場，牠們被認為是比貓熊更為重要（或至少等價）的在地符號而受到民眾關注。

由此可見，「貓熊來臺」案例所突顯的意義在於，貓熊非但是中國的國家象徵，且同時具有政治、保育、文化、經濟等不同意涵，而且由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貓熊的象徵性引起了意外的效果：一方面，臺灣本土物種作為在地的 (local) 符號登場，代表了對抗貓熊及其象徵系統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本土物種的保育卻也因此得到民眾關注。

進一步而論，除去「政治」或「保育」等動物的「外在價值」後，是否可能將貓熊「去符號化」，純粹以其物種 (species) 或是個體 (individual) 來喚起人們的保育（或動物保護）意識呢？以來臺的貓熊為例，動物園所展示的動物個體，是否能反映其所屬之種群、物種，乃至生態環境的困境，進而引領民眾認識保育工作的價值，皆是值得反省的問題。中國大陸政府在 2006 年初表示，被選中來臺的貓熊必須符合「年輕、美麗、健康、活潑、可愛」等五條標準。¹³⁴ 然而，這些被刻意選擇出來的個體，是否足以代表該物種、生物多樣性 (biodiversity) 及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和價值？從「保育教育」的角度出發，「可愛」的動物形象也許能吸引民眾關注動物個體，卻也可能令人產生對該物種、其他物種和自然生態帶有偏見的，甚至是錯誤的認識。若是圈養的動物個體，無法表現出動物自然的天性及行為，而僅以

¹³² 「愛圓仔更要愛黑寶——臺灣黑熊保育之路」出自黃美秀 2014 年之演講題目。臺灣黑熊保育協會 2014 年 4 月 29 日在國立政治大學的演講信息，於 2014 年 3 月 11 日公告於臉書粉專 (<https://www.facebook.com/TBBCA/photos/a.340919659304255/680685808660970/?type=3&theater>)，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¹³³ 「石虎抱抱」網站 (https://hugtaiwanleo.blogspot.com/?fbclid=IwAR2Hho_fhwl6Z57yS_ACvhlMevPSXI_E8a1xbi3Q-44BwHy6vDeVn_0JmZw)，最後檢索日期：2019.11.7。

¹³⁴ 〈2006 年 1 月 6 日國臺辦新聞發布會實錄〉，華夏經緯網，2006 年 1 月 6 日 (<http://www.huaxia.com/xw/gtbxwfbh/2006/01/377359.html?oeld3>)，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此處可參見 2007 年遴選赴香港貓熊的五項標準，「年輕、漂亮、健康、可愛、有繁殖潛力」，兩者略有差異。參見高保生、武少民，〈贈港熊貓遴選記〉，《人民日報》，2007 年 3 月 21 日，第 5 版。

其外貌獲得民眾的關注，這種以人的偏好出發的做法，似違背了「保育教育」的初衷及目的，亦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動物園是否發揮了「保育」和「教育」功能，是應該被檢視的問題。以本案例為例，臺北市立動物園曾分析「動物園的大貓熊新聞稿」和媒體報導之間的相關性，以此評估動物園的行銷效果。結果顯示，比例達 70% 的大量報導和新聞稿內容無關，乃屬「媒體自創」（以 2008 年 10 月為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大貓熊來臺後，商業性話題報導佔相關報導的 27.3%。¹³⁵ 由此可知，媒體不等同於動物園的傳聲筒，民眾也不易透過媒體獲得動物園所提供的信息。

最後，以雷根 (Tom Regan) 為代表的動物權理論強調，動物是自身的「生命主體」(subjects-of-a-life)。¹³⁶ 由此來檢視本案例中所謂的「保育」實踐，將能發現，對大貓熊而言，其所身處的環境僅有「域內／域外」之別，沒有人為劃定的國家等政治層面的意義。無論是否將「貓熊來臺」視作「境內」的移置，這樣的「保育」實踐都不會是動物在其自然棲息地的選擇。本案例所反映的，正是人類的政治動機，凌駕於貓熊及其生態的現實及需求。棲息於四川、甘肅、陝西一帶的大貓熊，本應僅是在該地域內活動的動物，卻被作為是從屬於國家的自然資源，是政治活動的籌碼。或許，正是因為與人類共有的動物性特質，作為在臺灣出生的「外省第二代」的「圓仔」，足以成為一種臺灣人身分的隱喻，加強了兩岸在生態／生物層面的紐帶。於此，「回家看看」的溫情呼喚，不僅針對「圓仔」更是針對臺灣民眾。¹³⁷ 在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政治觀點下，則自然地拒斥這種基於生物性事實的血緣、文化和身分的認同。

¹³⁵ 朱孝芬、蘇美齡，〈大貓熊來臺相關行銷活動對媒體與社會大眾觀感探討〉，頁 61。


¹³⁶ T.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xv-xvii.

¹³⁷ 劉淼淼，〈為「圓仔」慶生 川臺學子同當熊貓「守護者」〉，華夏經緯網，2014 年 7 月 16 日 (<http://www.huaxia.com/zt/jl/14-019/3980527.html?ejnc5>)，最後檢索日期：2019.11.24。

捌、結語

本文對大貓熊來臺的歷史脈絡進行重新建構，以呈現從 1988 年「特洛伊貓熊」(Trojan pandas) 輸入申請案的社會討論，到 2005 年起貓熊「和親」及「搶親」的歷史事件。長達二十年的歷程，突顯了貓熊「域外保育」從來不僅是純粹基於生態保育立場的活動，而是不同的政治立場，和經濟、文化等因素角力後的結果。¹³⁸

大貓熊作為在世界範圍內極具知名度和象徵性的物種，牠們既以「瀕危物種」之姿，號召人們對保育的關注，也是中國大陸乃至國際社會運用其符號，或是作為外交禮品，或是以「科研合作」為名進行租借的動物明星和國族象徵。在此背景下，透過對「團圓」、「圓圓」來臺歷史的爬梳，第四次與第五次申請案的關聯性，不止體現在引進計劃書之「保育教育方案」的內容大體一致，且動物個體、保育議題、國際公約、國家法律規定、政府的主管機關人事等皆相同，卻僅由於政黨輪替，執政黨的傾向和意志即令決議結果南轅北轍。

如果大貓熊來臺「團圓」是不再回去原鄉的和親之行，「圓仔」亦可被視為臺灣人身分之隱喻。貓熊除了是一個擁有多重意涵的、可變的符號，更是活生生的動物，與其他哺乳動物（包括人類）有著多半相通的生理特性，需要適合其天性的生活環境。貓熊保育在當代社會所反映的問題，或許正是將其作為一種特殊籌碼的意識型態，與從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的一連串互相關聯的價值之間的博弈。由此視角出發，回顧前後五次的大貓熊輸入申請案之歷史，或是「否決」、或是「核准」的結論，既反映了兩岸關係的變化，也呈現出不同執政黨的對大陸政策之差異，以及對「何謂保育」、「如何保育」的詮釋之可變性。

¹³⁸ 關於貓熊是一種「特洛伊木馬」的說法，於第一次申請案的討論過程中就被提出，直至 2005 年仍有「特洛伊熊貓」一說，參見陳承中，〈納下貓熊 小心木馬計!?中共若要派員探視 怎生拒絕 進口發現新的變數 機會已微〉，1988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社會觀察·大家談；〈引進熊貓 違反保育潮流 保育團體疾呼讓熊貓留在棲地 綠營立委憂心「特洛伊熊貓」效應〉，《自由時報》，2005 年 5 月 5 日，第 6 版／話題新聞。「貓熊和親」以及「搶親」的說法，則出自 2005 年第四次申請案的討論過程，參見全光輝，〈臺中想搶親 臺北信心足〉，《中時晚報》，2005 年 10 月 12 日，第 6 版／焦點話題。

徵引書目

一、專書

(一) 中文

方敏，《熊貓史詩》，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亨利·尼可斯 (Henry Nicholls) 著，黃建強譯，《來自中國的禮物：大貓熊與人類相遇的一百年》(*The Way of the Panda: The Curious History of China's Political Animal*)，新北：八旗文化，2011。

洪文棟、張和民、林美璫，《團團圓圓我的寶貝貓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08。

胡錦矗、喬治·夏勒 (George B. Schaller) 等，《臥龍的大熊貓》(*Wolong's Giant Panda*)，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胡錦矗主編，《大熊貓歷史文化》，香港：中國科學文化出版社，2008。

埃里克·巴拉泰 (Éric Baratay)、伊麗莎白·阿杜安·菲吉耶 (Élisabeth Hardouin-Fugier) 著，喬江濤譯，《動物園的歷史》(*Zoos: histoire des jardins zoologiques en Occident (XVIe-XXe siècle)*)，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喬治·夏勒 (George B. Schaller)，《最後的貓熊》(*The Last Panda*)，臺北：天下文化出版社，1994。

楊小燕主編，《北京動物園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2。

潘文石，《呼喊春天：貓熊虎子與我》，臺北：遠流出版社，2006。

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二) 英文

Miller, I. J. *The Nature of the Beasts: Empire and Exhibition at the Tokyo Imperial Zoo*.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Regan, T.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updated with a New Prefa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Songster, E. E. *Panda Nation: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a's Modern 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三) 日文

家永真幸，《パンダ外交》，東京：株式会社メディアファクトリー，2011。

二、期刊論文

史英，〈我們不該養貓熊〉，《人本教育札記》，第 191 期（2005），頁 2-3。

朱孝芬、蘇美齡，〈大貓熊來臺相關行銷活動對媒體與社會大眾觀感探討〉，《動物園學報》，第 21 期（2009），頁 55-72。

李桃生，〈細說大貓熊輸入〉，《臺灣林業》，第 35 卷第 2 期（2009），頁 57-64。

林美璵，〈大貓熊二十年來臺路歷程〉，《動物園雜誌》，第 117 期（2010），頁 4-7。

劉敏，〈拒絕「降級」的大熊貓〉，《三聯生活周刊》，第 11 期（2017），頁 102-109。

三、報紙

《人民日報》，2005 年 10 月-2007 年 3 月。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5 年 6 月-2008 年 12 月。

《中央日報》，2005 年 10 月 17 日。

《中時晚報》，2005 年 10 月 12 日。

《四川日報》，2011 年 8 月 16 日。

《自由時報》，2005 年 5 月-2008 年 12 月。

《破報·復刊》，2008 年 12 月 26 日-2009 年 1 月 4 日。

《經濟日報》，2006 年 1 月 7 日。

《聯合晚報》，1989 年 4 月-2006 年 3 月。

《聯合報》，1985 年 5 月-2006 年 4 月。

《蘋果日報》，2008 年 8 月 9 日。

“PANDA DIPLOMACY: CITES secretary says panda transport need not be report -ed.” *Taipei Times*, December 24, 200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08/12/24/2003431927> (accessed November 24, 2019).

四、學位論文

林秀穎，〈動物園行銷與媒體效果之研究——以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圓仔」成長議題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4。

張綺砮，〈臺灣地區動物園管理、教育與動物福利議題研究〉，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3。

Songster, E. E. “A Natural Place for Nationalism: The Wanglang Nature Reserv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Giant Panda as a National Ic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五、網頁資料

〈2006 年 1 月 6 日國臺辦新聞發布會實錄〉，華夏經緯網，2006 年 1 月 6 日 (<http://www.huaxia.com/xw/gtbxwfbh/2006/01/377359.html?oeld3>)，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 〈M 型化動物園：廠商捐款、動物照護天差地遠〉，新聞稿，2008 年 4 月 11 日，臺北市士林北投議員吳思瑤部落格 (<https://rosalia0528.pixnet.net/blog/post/9605793>)，最後檢索日期：2020.4.27。
- 「石虎抱抱」網站 (https://hugtaiwanleo.blogspot.com/?fbclid=IwAR2Hho_fhWL6Z57yS_ACvhlMevPSXIE8a1xbi3Q-44BwHy6vDeVn_0JmZw)，最後檢索日期：2019.11.7。
- 中評社香港 3 月 24 日電，〈潘文石支持熊貓贈臺 扁曲解《呼喊春天》〉，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reate.jsp?docid=100114987>)，最後檢索日期：2019.11.24。
-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5 成 6 民眾贊成大陸貓熊來臺〉，新聞稿，2008 年 7 月 22 日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C09570BF137950A2#)，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致監察院檢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動社研字 97 年第 023 號，2008 年 12 月 4 日 (<https://www.east.org.tw/sites/east/files/content/upload/File/3-61-2.pdf>)，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動物園要逼多少動物發瘋！才夠？誰來關心臺灣已發瘋的「肖熊」〉，新聞稿，2005 年 11 月 15 日 (<https://www.east.org.tw/action/1106>)，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貓熊案重要聲明——呼籲政府落實民主、透明審議、公開辯論〉，新聞稿，2008 年 8 月 13 日 (<https://www.east.org.tw/action/1245>)，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 社團法人臺灣動物社會研究會，〈魔鬼藏在哪個細節裡？把貓熊當中藥？讓陳雲林夾帶（走私）來臺嗎？馬「總統」，臺灣還是個國家嗎？〉，新聞稿，2008 年 9 月 17 日 (<https://www.east.org.tw/action/1248>)，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 張玉琦，〈打造動物代言人圓仔創造吸睛精與吸金效益〉，《經理人》，2014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0257>)，最後檢索日期：2019.11.24。
- 黃美秀，〈從貓熊圓仔看臺灣黑熊保育〉，《天下雜誌》，2013 年 8 月 22 日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554>)，最後檢索日期：2019.11.7。
- 臺北市立動物園網站 (<https://www.zoo.gov.taipei/>)，最後檢索日期：2016.6.1。
- 劉淼淼，〈為「圓仔」慶生 川臺學子同當熊貓「守護者」〉，華夏經緯網，2014 年 7 月 16 日 (<http://www.huaxia.com/zt/jl/14-019/3980527.html?ejnc5>)，最後檢索日期：2019.11.24。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https://www.iucnredlist.org> (accessed June 16, 2020).

六、文件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公告〉，發文字號：貿服字第 0910150408-01 號，2002 年 7 月 1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59w2VqaasX9L0M8Hd4_juy0QBvY9NjU/view?usp=sharing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59w2VqaasX9L0M8Hd4_juy0QBvY9NjU/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財團法人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附設動物園、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兩岸大熊貓和野生動物保育學術研究交流企劃書〉，2005 年 10 月 15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duCpuOG8Bnsz8Ci5bCPpdL1uPjze6RA/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臺北市立動物園，〈大貓熊引進飼養管理計畫〉，2005 年 9 月 30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4QiAdYvc7xHfQquMlpPIhRaPPkZRN0z/view?usp=sharin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等，〈陳情函〉，受文者：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6 年 11 月 9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7ED4j0kQ4KuP9W66mKMH6ZfCV2WnOl6/view?usp=sharing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7ED4j0kQ4KuP9W66mKMH6ZfCV2WnOl6>），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劉小如，〈致「大熊貓案審查會議」〉信函，2006 年 3 月 30 日（<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fBXr5wYegwrRqU82NOcUntQQv3x-Nfg/view?usp=sharing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fBXr5wYegwrRqU82NOcUntQQv3x-Nfg>），最後檢索日期：2020.6.16。

（責任編輯：陳琬蓉）